

# 我們可以從明代道德故事類書中 讀出什麼？—— 知識編輯、文化網絡與通俗忠觀

劉瓊云\*

《日記故事》，一種依道德條目分類集纂的故事類書，初編於宋元，盛行於明代，並大量傳播至朝鮮與江戶時期日本。本文立基於中、日語學界對於《日記故事》的初步考察，進一步探究兩大問題：一、我們如何更恰切理解《日記故事》的內涵、作用與重要性？二、這樣的材料如何有助從新視角理解「忠文化」在近世中國的傳播？本文首先檢視早期《日記故事》朝鮮本中的序跋、凡例文字、道德條目分類與故事內容，繼而納入其他版本圖文參照比較，最終引入明代《日記故事》用例的記載及其與小說、戲曲間的關係，闡明此書結合道德教育、歷史知識與文藝表現的特質；並藉此呈顯「忠德」文化表述的動態多樣性。面對「忠德」內蘊的實踐問題與暴力潛質，《日記故事》編者或嘗試透過類型區別加以調和，或為吸引讀者持續強化元代《君臣故事》與早期《日記故事》中已共見的暴力元素，或透過圖文合作視覺美化突顯忠臣人物的英雄特質。書中各形各色的人物典範言行，透露著當時讀者可能得到的閱讀趣味，道德訊息內部可能的複雜性，以及道德言說、行動作為一種文化資本與意義符號，在近世社會中傳播變化的過程。

關鍵詞：日記故事、忠、類書、出版文化、蒙書

---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 一、前言

「忠」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大題目。特別是早期中國研究領域中，從出土文獻到先秦諸子各家環繞忠德的論辯，士大夫在忠於社稷抑或國君兩者間的裁量拉鋸，以及進入帝制中國後儒家倫理的作用、變化，學界要論已多。<sup>1</sup>「忠」作為帝制中國政治與倫理結構的基礎，至宋代理學興起將倫理修養提升至「天理」的高度，「道統」高於「治統」，復在政治向度外，再予「忠德」超越性的精神向度；過去學界對於忠德、忠道的討論大體聚焦在帝國統治階層的政治現實，士大夫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道德抉擇。<sup>2</sup>相對於這些以重要學者、士大夫之言說撰著

<sup>1</sup> 此方面論著可參見葛荃，《政德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Yuri Pines, “Friends or Foes: Changing Concepts of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and the Notion of Loyalty in Pre-Imperial China,” *Monumenta Serica* 50 (2002): 35-74; Paul R. Goldin, “When *Zhong* 忠 Does Not Mean ‘Loyalty’,”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7:2 (June 2008): 165-174.

<sup>2</sup> 如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謝正光，〈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山東萊陽姜氏行誼考論〉（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頁 291-343）；James T.C. Liu, “Yüeh Fei (1103-1141) and China’s Heritage of Loyal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2 (1972): 291-297; Richard L. Davis,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Jennifer W. Jay,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l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A.: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 in Liao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Lynn A. Struve, “Self-Struggles of a Martyr: Memories, Dreams, and Obsessions in the Extant Diary of Huang Chuny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9:2 (December 2009): 343-394.

為進路的考察，本文希望能透過流行於晚明的道德故事類書材料，較深入探索忠文化在當時社會傳播生長和變化的樣態。

當我們將視野從政治、思想上層往下打開，不難發現就觀念的實際傳播、運作上，至少到了晚明，對於「忠」的認知以及此認知所引發的行動、作用，其實瀰漫於社會各階層。「忠」除了界定君臣關係，規範士大夫的社稷之責；就社會行為而言，忠德的實踐與士大夫個人及家庭的名聲密不可分，它不僅是道德表現，也是某種精神文化性資本，「盡忠」之名不僅可以顯揚父母在理論上成就「大孝」，也影響個人在同儕、同僚間的聲譽，連帶其仕途與事業的經營。<sup>3</sup>即使是未受官職不食君祿，不在「忠」倫理要求範圍內的民眾，其生活中也充滿了各種標榜忠義英雄的故事、戲曲，有形無形中傳遞著某種忠觀。換言之，「忠」除了是一個道德條目、一種政治倫理，在晚期帝制中國更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文化，不僅關乎大夫的責任意識與自我定位，也觸及民眾的道德感知和對於「忠臣」的印象、認定或期待。如岸本美緒便已指出在十七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並非簡單對立；地方官吏、鄉紳與民眾在多元權威並立的流動社會中互動，民間的人望乃前兩者威信的重要來源，民變的發生則往往是以具體的個人道德問題為攻擊目標。<sup>4</sup>可見官民互動、輿論作用與民眾行為，皆牽涉道德名聲，而五倫中與政治治理和社群公領域關係最密切者，非忠莫屬。

而傳布此一忠觀的媒介，不僅是儒家經典，還有更多更簡易、傳

---

<sup>3</sup> 關於明末清初政治文化與士大夫道德形象的塑造，可參見 Ying Zhang, *Confucian Image Politics: Masculine Mor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sup>4</sup> 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 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頁 1-16。筆者也參考了巫仁恕，〈評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 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新史學》，11：3（臺北，2000.9），頁 213-223。

播效果更佳的故事、小說、戲曲。如此正典義理與通俗文學共同運作，透過教育結合藝文，靈活觸動讀者觀眾的效用，將一種道德觀念帶入社會上下階層的學習與娛樂生活之中。

有鑒於此，近期文學研究者也開始從道德情感與想像的角度，重審明清小說中的倫理向度。<sup>5</sup>然相對於孝文化所得到的關注，忠文化的探討仍相當有限。部分原因可能在於「忠」連結家與國，交織社會責任與個人情感。一方面，其涉入名譽、輿論生成背後的道德價值判準，帶有公共性甚至表演性，<sup>6</sup>另一方面，作為道德理想，亦是不少士大夫真誠的終極追求。在公與私、群與我、抗議與妥協、直諫與隱退、外在表現與內在情感、現實權衡與精神理想之間，忠德在理論與實踐上的複雜性令人卻步。然對於理解明清時期的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其作為五倫之首的核心位置又不容忽視。

筆者認為，面對明清複雜的忠文化現象，《日記故事》這般盛行於明代中後期的道德故事類書，是有助於我們切入當時思想生活肌理的重要材料。《日記故事》初編於元代，原意作為蒙學教材。進入明代後刊行不輟，隨著中後期出版文化蓬勃，此書既可作為學塾之用，又因其搜羅歷史人物道德事蹟，提要簡述的內容性質，擴充後可做為

---

<sup>5</sup> Maria Franca Sibau, *Reading for the Moral: Exemplarity and the Confucian Moral Imagin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Short Fi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8); Maram Epstein, "Filial Piety as an Emo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Keyword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Wai-ye Li and Yuri Pin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sup>6</sup> 忠與表演性的討論，可參考 Frederic E. Wakeman Jr., "Romantics, Sto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in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edited by Lea H. Wakeman, 116-12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曹依婷，〈楊繼盛與「忠臣楊繼盛」之間——一個明代忠臣之再詮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科舉參考書，配上插圖可吸引識字程度較低，相對廣泛的讀者群，故書商競相重編重刻，版本眾多。這批材料相當程度上能從教育傳播媒介和閱讀接受的角度，補充過去以經典文獻、士人言說為主要的研究取向。其重要性可從元明兩代的承繼關係、故事媒介的跨界性效用、「忠德」內涵的變化來談。

首先，元明兩代的承繼變化關係。學者已指出，元代編寫的童蒙教科書對於新儒學理念的下滲傳播，影響力不亞於同時期大儒的教說宣揚。<sup>7</sup>過去研究多關注為初學者所做的《四書》等儒學經典旁註，或「蒙求」類書籍，<sup>8</sup>較少注意到故事類書這類材料。雖然《日記故事》元代版本已佚，我們無從得知元版《日記故事》原貌與明版做全面性的比較，但現存明本保存有元代初編者虞韶序文，說明其書編纂原則、取材來源、預期效用，再輔以性質近似的元代《君臣故事》，大致足以呈現「忠德」在早期通俗故事類書中的樣貌。透過比較同一人物事件在《君臣故事》和晚明《日記故事》中的敘事文字與圖像表現，得以看出「忠德」之教重點特色的承繼和變化。如此，這部書現存各本序跋材料及相關副文本(paratext)仍提醒著晚明活躍的出版文化背後，與元代之間的承繼關係，且包藏大量訊息透露明代中期之後，這些原已流傳的書籍如何進一步被更新重編，在晚明私塾家塾急增，通俗讀物需求擴張，即使農工商階層也常視讀書識字為值得的教育投資之社會環境下，持續發揮作用。

其次，故事媒介的跨界性效用。《日記故事》以儒家倫理體系為經，

<sup>7</sup> 劉祥光，〈中國近世地方教育的發展——徽州文人、塾師與初級教育(1100-180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臺北，1997)，頁1-45。

<sup>8</sup> 如劉祥光討論陳櫟(1252-1334)《論語訓蒙口義》、胡炳文(1250-1333)的《純正蒙求》、朱升(1299-1370)的《小四書》。見劉祥光，〈中國近世地方教育的發展〉，頁20-26。

歷史人物事蹟為緯，將儒家「成人」之學的結構、內涵收納(encapsulate)於一書之中。透過故事的形式，道德楷模與歷史人物結合一處，既是儒學教材，也是史傳知識來源和故事讀本。<sup>9</sup>前述學塾舉業用途之外，此書也是重視教育的母親為年幼子女講述的故事內容。<sup>10</sup>除了中國內部，在帝國邊區，明代地方官亦有取此書作「化俗」、「化夷」之用者。<sup>11</sup>此書現

<sup>9</sup> 教學上，《日記故事》常與《四書》並行。晚明王在晉(?-1643)提倡復興地方社學，主張教育學童當「授以《孝經》、《小學》及《四書》、《日記故事》，講說使知大義。」黃道周(1585-1646)在獄中致信兄長，叮嚀其二子教育：「夙夜讀《四書》，溫《詩》、《書》兩經，再讀《禮記》諸大篇及《易》，皆略為解說。看《日記故事》及小學，勿令輟功也。」王在晉，《越鐫》(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0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影印)，卷17，〈崇化論〉，頁17a-18a。黃道周，《黃石齋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8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鄭琰刻本影印)，卷5，〈京師與兄書〉，頁21b-22a。

<sup>10</sup> 如楊守陳(1425-1489)為里中徐節婦作傳，其子甫生三月，其夫亡。節婦教導幼子，「親取《小學》、《論》、《孟》及《日記故事》，手執女工而口授之，為講解其大義。」張岱高祖父張天復(1513-1578)筆下的周孺人「常訓子女以《日記故事》，女訓童稚，忻忻思嚮必長有成而後已。」見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弘治十二年[1499]楊茂仁刻本影印)，卷11，〈徐節婦傳〉，頁13b-14b。張天復，《鳴玉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1580]陳文燭刻本影印)，卷7，〈明故廣濟居士朱公配孺人周氏合葬墓誌銘〉，頁16a-19a。

<sup>11</sup> 黃佐(1490-1566)《泰泉鄉禮》中鄉校的教學內容，包括「朱子《小學》及《日記故事》內古人嘉言善行。」井上徹洞見指出黃佐《泰泉鄉禮》之作，應放在漢族士人於明代移民開發最前線——非漢族住民眾多的廣東——推行儒教化運動的脈絡下理解。此外，郭應聘(1520-1586)巡撫廣西，上疏建議武力鎮壓猺、獞亂後，於當地選立社師，教導當地幾為獞俗同化的漢族子弟習字、學禮、知倫類，「所攻者寫做，所讀者教民榜《日記故事》諸書，所習者洒掃應對揖拜坐立之節。」黃佐，《泰泉鄉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存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乃嘉靖時期(1522-1566)朝鮮官員愛悅其於中國所見《日記故事》，加以覆刻之作，再加上現今日本各圖書館收藏多種《日記故事》漢和刻本，<sup>12</sup>皆說明此書流傳中國內外，其傳播儒家乃至漢文化「原始碼」的作用力量，不可輕忽。<sup>13</sup>《日記故事》初編時簡明易曉，吸引童稚的訴求，恰也正是日後此書跨越不同社會階層，廣為流播中國內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簡明易曉，並不表示此書內容無足可觀。就「忠德」內涵的變化而言，《日記故事》從經典史籍中取材簡化，重新整編，其架構、分類、註解、事例選取原則乃至圖文關係，不僅呈現了道德歷史知識在近世中國通俗化過程之一端，亦透露通俗化過程中，編者如何透過故事的去取、敘事焦點的轉移、圖像的重構，處理忠德本身內蘊的價值衝突，進而導致其內涵的變化。由此出發可帶出一連串的問題：道德故事書，對於傳播忠臣形象，示範政治行動，乃至在廣大讀者心目中構成某種對於君臣治道的想像，可能具有什麼樣的作用？在將抽象概念形諸文圖「具象化」的過程中，哪些歷史人物獲選作為忠臣典範？

---

3，〈鄉校〉，頁 7b。井上徹，〈中国近世の都市と礼の威力〉，《年報都市史研究》，15(東京，2007.12)，頁 4-18。郭應聘，〈郭襄靖公遺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4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郭良翰刻本影印)，卷 4，〈議懷永善後事宜疏〉，頁 7a-b。

<sup>12</sup> 參見林桂如，〈明代《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東傳情況〉，收入林桂如，《勸善垂戒，孝行可風——從中日出版文化論漢籍之東傳與承衍》(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頁 11-52。

<sup>13</sup> 美國學者馬丁·普赫納(Martin Puchner)探討故事形塑人類文明與歷史的作用，指出基礎文本(fundamental texts)歷經長期流播傳衍，具有成為文化原始碼(source codes for entire cultures)，指導其社群認識一己所從來，該當如何生活的文化凝聚力(cultural cohesion)。Martin Puchner, *The Written World: The Power of Stories to Shape People, History Civil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7), xvii-xviii.

編者如何濃縮這些人物的史傳成為能吸引初階讀者的敘述？時至晚明出版市場蓬勃競爭，讀者的需求與喜好是否亦逆向影響書坊主的選編策略？再者，公共輿論的場域中，忠臣聲名得以樹立，取決於忠臣個人作為與「觀眾」對其作為的接受詮釋達成一致。人臣「作忠」，還需要觀者正確理解其言行，認可其忠，此乃符號與意義、表現與詮釋雙向運作的過程。如此，則我們還可再問，人臣「作忠」所本的行為符碼是何樣態？若能仔細檢視、比較、分析《日記故事》這批材料的序跋文字、編輯形式和表現手法異同變化，這批往往圖文並茂的通俗道德故事，當中其實大有可觀。

以上三點是目前《日記故事》相關研究所未及，而本文特別關注討論之處。《日記故事》自上世紀後期，因日本學者酒井忠夫(1912-2010)對於明代日用類書與庶民教育關係的研究，開始得到較多學界重視。<sup>14</sup>然而之後酒井氏的關注點聚焦於宗教善書與日用類書，<sup>15</sup>中外學界對於類書材料的運用方向亦同。<sup>16</sup>相對而言，以儒家倫理故事為主軸的《日記故事》，學者討論有限，早期大多聚焦於書籍版本以及「二十四孝」

<sup>14</sup> 參見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收入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東京：国土社，1958），頁 25-154。

<sup>15</sup> 酒井忠夫兩部這方面的重要著作分別為《增補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99-2000）與《中国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2011）。

<sup>16</sup> 主要可見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5）；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臺北，2003.9），頁 1-85；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故事形成的考察和梳理，<sup>17</sup>或從傳統蒙學的角度切入。<sup>18</sup>近期在出版文化研究帶動之下，此類道德故事類書復受關注，取法多為力求「全面考察」的綜觀通論，其貢獻在於對這些書籍的出版背景、刊刻書坊與文獻藏地，在先前日本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加以補充，更有力顯示這類書籍版本之多，刊行之廣，<sup>19</sup>但仍未能深入發掘這類通俗道德類書之於開展近世中國文學、文化以及思想生活等研究面向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像《日記故事》這樣的材料，自王汎森所論思想與生活相互滲透的關係思考，其深入家庭、學校、連接社會活動乃至娛樂文化，實乃浸潤於生活中的通俗思想文本，<sup>20</sup>也是思想、史傳、藝文、商業交會構成的文本空間，需要超越目前以版本文獻學為主軸的研究方法，結合道德教育、書籍編寫、文圖表現等研究視域，方能深入開掘這類通俗道德類書的重要性。

具體做法上，由於《日記故事》版本眾多，版式編排隨著書商的成本考量和讀者設定別異，以下第一節將先說明本文如何利用筆者所考察的 12 部《日記故事》，加以整理分析作為之後論述的基礎。其中並將特別聚焦於現存早期的朝鮮四字堂錦溪刊本《新增圖像小學日記

<sup>17</sup> 大澤顯浩，〈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明代研究通訊》，5(臺北，2002)，頁 11-33；金文京，〈《孝行錄》と「二十四孝」再論〉，《藝文研究》，65(東京，1994)，頁 269-287；橋本草子，〈「日記故事」の版本について——二十四孝図研究ノト〉，《人文論叢》，46(京都，1998)，頁 33-58；〈「日記故事」の現存刊本及びその出版の背景について〉，《中國——社會と文化》，21(東京，2006)，頁 108-124。

<sup>18</sup>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sup>19</sup>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苑磊，〈明代故事匯編類書籍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2014)。

<sup>20</sup> 王汎森，《思想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頁 20。

故事大全》(以下簡稱朝鮮本)。<sup>21</sup>目前中英語學界極少注意到此一罕見版本，僅日本學者橋本草子做了基礎性考察。筆者將透過當中保存的豐富序跋文字，呈現元代虞韶編撰此書的原初理念構想，以及之後其他明代編刊者所見此書之價值用途。接著以朝鮮本為主，其他 11 種晚明版本為輔，於文章第二節考察忠德在《日記故事》中如何被呈現：指出當中「忠諫」與「死節」類敘事格外突出，檢視其敘事模式和當中透過人物行為、語言標誌出的忠臣特質，並析論這些故事所透露，編者一方面特意標舉忠臣不畏權勢直諫或拒敵的抗爭精神，另一方面同時注重調和君臣衝突的努力。第三節進一步從圖像呈現與圖文關係，分析明代不同版本處理忠臣敘事和圖像表現時，在暴力化和英雄化兩種趨向之間，如何取舍或加以融合。以上兩部分皆特別注意這些故事表現挑動、刺激讀者情緒、感官的作用。最後第四節透過細察《日記故事》閱讀使用的多樣方式，指出其與小說、戲曲文化活動之間的交涉串連，重新思考通俗故事形塑晚明忠文化作用與力量。相對於道德故事類書到目前為止多被視為蒙學讀物，與小說戲曲別類，筆者認為必須打破習慣性的文類分野，指出其彼此間的關聯，方能從整個文化網絡呼應共振的角度，更貼近理解晚明「忠觀」的文化生活面。

## 二、《日記故事》是一部什麼樣的書？

現存最早的《日記故事》為福建建陽書坊主熊大木於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刻的《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以下簡稱熊大木本)，<sup>22</sup>承襲

<sup>21</sup> 此本 10 卷 2 冊，虞韶，《新增圖像小學日記故事大全》(日本蓬左文庫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朝鮮四字堂錦溪刊本)。

<sup>22</sup> 此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影印本收入虞韶纂集、熊大木校註，《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收入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 2 冊，

元代以來建陽刊行書籍常見的「上圖下文」形式，每頁一圖約占版面三分之一大小。其次為朝鮮本。此本跋文題為「嘉靖丙寅季夏奉正大夫行錦山郡守兼春秋館編修官」李義臣所撰，丙寅年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文中說明李氏於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春初見此書，乃「唐本到我東者，罕焉」，當時未能得此書，「往來於懷久已。今得而寶之，告諸監司柳相昌門謄書圖像鋟梓廣布」，可見此本在中國刊印的時間尚更早於此。<sup>23</sup>熊大木本的版畫有其特色，版畫學者常以之為建陽版畫「樸素」風格之例。<sup>24</sup>然此本品質仍稍遜於朝鮮本，且僅有一篇熊大木的簡短序文，卷2以及收錄「忠德」故事的卷9後段、卷10大半殘缺嚴重。相形之下，朝鮮本收錄了《日記故事》初編者元代虞韶的〈小學日記序〉，另一位明代編者管昉撰於弘治十年(1497)的序文與提綱，書末除前述李義臣敘述此書刊刻始末，並有「勤有書堂新刊」以及朝鮮「四字堂錦溪刊」牌記，全書共10卷，刻工精良，也是上圖下文形式(附圖1)，收錄393則故事。筆者同意橋本草子判斷，此本雖在出版年上晚於最早的熊大木本，但當中保存相當完整的序跋刊記資料，實更能傳達原書旨趣，彌足珍貴，<sup>25</sup>也是我們檢視較早期《日記故事》之編纂分類構想、「忠德」故事分佈樣態的理想切入點。

下文以朝鮮本為基點，先梳理元代《日記故事》編者虞韶的教化理念和原初構想，以及此本中所呈現，明代弘治(1487-1505)到嘉靖(1522-1566)年間「忠德」故事的編選取向。之後據此與筆者所搜羅的其他11種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據明嘉靖廿一年[1542]刊本影印)。

<sup>23</sup> 朝鮮本，冊2末跋文。

<sup>24</sup> 薄松年，〈古樸純真的建安古代版畫〉，收入周芑、周路、周亮編著，《建安古版畫》(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9)，頁4。

<sup>25</sup> 橋本草子，〈「日記故事」の現存刊本及びその出版の背景について〉，頁109-110。

晚明《日記故事》版本，相互比較對照，檢視《日記故事》自元代至晚明的編輯走向與發展變化。文中納入綜觀比較的《日記故事》版本如下：

1. 虞韶纂集，熊大木校註，《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9卷2冊，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本。(簡稱熊大木本)
2. 虞韶纂集，管昉增校，胡琰圖像，《新增圖像小學日記故事大全》，10卷，嘉靖丙寅年(1566)李義臣跋。(簡稱朝鮮本)
3. 不著編者，《日記故事》，2卷，國家圖書館藏，嘉靖四十五年(1566)朱天球序。(簡稱朱天球本)<sup>26</sup>
4. 吳宗札校正，《鼎鐫校增評註五倫日記故事大全》，4卷4冊，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萬曆甲午(1594)鄭世豪(雲竹)刊本。(簡稱鄭世豪本)
5. 江湖逸士完初子編輯，《新刻標題註釋出像鳳毛日記故事》，4卷首1卷，萬曆辛亥年(1611)忠慶堂余熙宇刊本。(簡稱余熙宇本)<sup>27</sup>
6. 詹應竹校正，《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便覽興賢日記故事》，4卷首1卷，日本內閣文庫藏，萬曆辛亥年(1611)黃正甫

<sup>26</sup> 朱天球，福建漳州漳浦縣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曾任山東督學，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其視學山東時，有感於當地「古風漸遠」，「立四隅社學，頒《日記故事》，俾所在童而習焉」。蔡獻臣，《清白堂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刻本影印)，卷13，〈明南京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澹菴朱公傳〉，頁12a。橋本草子推測，相對於多數《日記故事》皆為坊刻本，此本很可能為官刻本。橋本草子，〈「日記故事」の現存刊本及びその出版の背景について〉，頁110。

<sup>27</sup> 此本首卷標題《新刻標題二十四孝鳳毛日記故事》，其後卷1標題《新刻標題註釋出像鳳毛日記故事》，題江湖逸士完初子編輯，閩建書林余熙宇梓行。江湖逸士完初子編輯，《新刻標題註釋出像鳳毛日記故事》(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66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據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余熙宇忠慶堂刊本影印)。

刊行。(簡稱黃正甫本)<sup>28</sup>

7. 不著編者，《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魁字便蒙日記故事》，4卷首1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萬曆甲寅年(1614)四有堂周靜吾刊本。(簡稱周靜吾本)<sup>29</sup>
8. 不著編者，《新鐫重訂補遺音釋日記故事大成》，存4卷1冊，萬曆年間熊氏雲吾書舍刊本影印。(簡稱雲吾書舍本)<sup>30</sup>
9. 張瑞圖校，《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和刻本7卷，萬曆年間劉龍田刊本。(簡稱劉龍田本)<sup>31</sup>
10. 楊喬編，《新刻太倉藏版全補合像註釋大字日記故事》，4卷首1卷，明閩建劉君麗刊本影印。(簡稱劉君麗本)<sup>32</sup>

<sup>28</sup> 此本首卷標題《□便蒙二十四孝日記故事》，其後卷1標題《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便覽興賢日記故事》。首卷題洪都詹應竹校正、書林黃正甫梓行。詹應竹校正，《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便覽興賢日記故事》(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辛亥年[1611]黃正甫刊行)，<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0103147&ID=&TYPE=&NO=>，擷取日期：2019年6月17日。

<sup>29</sup> 此本首卷題名為《鐫便蒙二十四孝日記故事卷之一》，其後卷1題名《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魁字便蒙日記故事》。

<sup>30</sup> 不著編者，《新鐫重訂補遺音釋日記故事大成》(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第13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據明萬曆年間熊氏雲吾書舍刊本影印)。此本現存卷5、卷6、卷7、卷8，其中卷7與卷8屬「臣道」典範。

<sup>31</sup> 張瑞圖校，《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日本寬文十二年[1672]跋京都上田甚兵衛刊延寶二年[1674]九月刊本影印)。

<sup>32</sup> 楊喬編，《新刻太倉藏版全補合像註釋大字日記故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第14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據明閩建劉君麗刊本影印)。

11. 陳繼儒較釋，《日記餘芳故事》，上下2卷首1卷，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明余奉軒刊本。(簡稱余奉軒本)<sup>33</sup>
12. 不著編者，《便覽聯輝日記故事》，3卷，日本內閣文庫藏，明魏岐鳳刊本。(簡稱魏岐鳳本)<sup>34</sup>

在此有必要說明，上列12部刊本，與橋本草子考察中國、日本與歐洲圖書館藏明代《日記故事》共25種，數量看似有所落差。然而這類通俗類書的編寫製作，多在既有的版本基礎上增刪調整。此處12本中，朝鮮本收錄故事為各本中最多，以「忠德」故事而言，無論故事數量亦豐的劉龍田本，抑或其他篇幅較小故事數目較少之版本，大致不出朝鮮本所收錄人物事例的範圍。總體而言已足以在相當程度上，呈現明代《日記故事》的不同編輯策略與發展方向，支持本文考察道德故事類書形塑通俗忠觀的可能效力與作用。

此處12部刊本整體看來，刊行於十六世紀末的前四本品質相對較為整齊，皆屬良版。<sup>35</sup>進入十七世紀之後刊刻的密集度增加，特別如萬曆辛亥同年有兩部出版。12本中，編號4、9的鄭世豪本與劉龍田本尤

<sup>33</sup> 此本首頁題「日記餘芳故事」書林余奉軒梓。首卷標題「新刻全像二十四孝日記故事餘芳卷之首」。卷上標題「新鐫全像分類註釋餘芳故事卷上」，並註「雲間眉公陳繼儒較釋」，恐為偽托，卷下標題「新刻全像註釋餘芳故事卷下」。陳繼儒較釋，《日記餘芳故事》(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明余奉軒刊行本)，[http://base1.nijl.ac.jp/iview/Frame.jsp?DB\\_ID=G0003917KTM&C\\_CODE=XYU1-044-02](http://base1.nijl.ac.jp/iview/Frame.jsp?DB_ID=G0003917KTM&C_CODE=XYU1-044-02)，擷取日期：2019年6月17日。

<sup>34</sup> 不著編者，《便覽聯輝日記故事》(日本內閣文庫藏，明魏岐鳳刊本)，<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0103148&ID=&TYPE=&NO=>，擷取日期：2019年6月17日。

<sup>35</sup> 編號1熊大本本由於末卷殘缺，未知其確切故事數目。其卷9所收故事與朝鮮本卷9比較，重疊率高，但前者數量僅約占後者三分之二。

值得注意。此二本刊刻品質不亞於朝鮮本，所選故事雖保有一般《日記故事》常見的核心事例，但增入的故事類型、人物事蹟，與他本相較變化較大。鄭世豪本圖文並茂，評註文字中大量節錄宋明學者史學著作補充故事正文，卷1「君臣類」與卷4「治國類」故事數量遠較一般《日記故事》為多，顯見此本針對較高階的應試舉子而設計。劉龍田本暴力色彩特別突出，並且是在日本江戶時期最廣被翻刻的《日記故事》版本。此二本將於下文第三節特別進行分析。編號12魏岐鳳本上欄為千家詩選，下欄日記故事，選入故事數量明顯少於一般，異於多數晚明版本的做法，提供《日記故事》與其他蒙學讀物上下欄分配合刊較特殊的例子。其餘編號3、5、7、8、10、11各本雖然刊刻水準參差，但忠德類故事數目相差不大，所選人物事例重疊性高，大致可代表明代《日記故事》忠德楷模的最大公約數。本文第二、三節所論之忠德範式典型，大體依據上列12本中不斷重出的人物故事。至於各本的詳細描述，由於橋本草子的考察已相當完整，且限於篇幅，筆者不再贅述。

前文已提及，現代學者多將《日記故事》定位為「蒙書」或「通俗類書」。如此歸類並無錯誤，但若回到《日記故事》刊行的原初脈絡，此書的使用方式、可能讀者、與史學、文學、道德學問之間的放射連結，則往往因為現代學術範式分門歸類的習慣，多少受到遮蔽。欲確切把握此書之性質特色，我們還需回到最初的編作者虞韶及其〈小學日記序〉。

關於《日記故事》編者虞韶，現存資料相當有限。最早記載見於明代弘治三年(1490)刊行，黃仲昭(1435-1508)編撰的《八閩通志》中，附於建寧府「文苑」人物毛直方之下：

[元]毛直方，字靜可。建安人。宋咸淳中預薦。入元，授徒講學，士爭趨之，有《聊復軒藁》二十餘卷，嘗編《詩宗群玉

府》三十卷及《詩學大成》。後被一命，得教授半俸終其身。同縣人虞韶，字以成，嘗纂集《小學日記切要故事》行世。虞廷碩，字君輔，嘗編集《歷代詔令》四卷、《制誥》五卷、《古賦準繩》十卷行世。劉邊，字近道，工詩，有《自家意思集》。<sup>36</sup>

虞韶與虞廷碩的生平，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資料。毛直方與劉邊稍有蛛絲馬跡可循。毛直方入元後雖然「當路有薦其才者」，但以原憲、顏回(521 BC- 481 BC)安貧樂道自期不仕，「優游閭里，考德問業者爭趨之」，於地方上講學聲名頗著。後科舉興，其生徒多有高中者，省府上其名，得教授一職致仕，以半俸終身。<sup>37</sup>劉邊於《自家意思集》之外另著有《讀史摭言》。《閩中理學淵源考》記載附之於熊禾(1247-1312)學派下，<sup>38</sup>同時以詩名。出身北方的張之翰(1243-1296)曾讀劉邊《草窻詩藁》，評其「風骨秀整，意韻閑婉，在近世詩人中，儘不失為作家手。」<sup>39</sup>劉邊亦曾參與月泉吟社分賦〈春日田園雜興詩〉，吟社創立者吳渭讀其詩中「耕鋤曉雨有餘地，應接東風無暇

<sup>36</sup> 黃仲昭，《八閩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78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影印)，卷65，頁22b。

<sup>37</sup> 蔣易，《皇元風雅》(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元建陽張氏梅溪書院刻本影印)，卷12，〈毛靜可郡文學建安毛直方〉，頁14b。

<sup>38</sup>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37，〈劉先生邊〉，頁22b。

<sup>39</sup> 張之翰，《西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8，〈跋草窻詩藁〉，頁7b-8a。



時」句，「極賞歎之」。<sup>40</sup>毛直方和劉邊皆為宋末元初閩北建寧府人，文化活動以理學講論和詩文寫作為主，經歷易代入元後，在鄉邑承當地自南宋以來活絡的出版文化，寫作編書，此外亦得以講學維生。同縣人虞韶和虞廷碩，或許持生形態近似，然材料所限難以確知。

儘管虞韶生平資料無幾，保留於朝鮮本《日記故事》中，虞韶所撰之〈小學日記序〉，清楚說明了其編纂此書取法所由來，預期的讀者與效用，以及取材和故事揀擇的考量。《日記故事》書名取自楊億(973-1020)家訓，此序開篇首先引楊億之言：<sup>41</sup>

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sup>42</sup>

這裏指出欲長養幼童良知良能，除了文理記誦，還當趁其心智柔軟定見未成之時，與之講說古今人物之美德善行，以收潛移默化之效，其中點出人格養成教育的要素在於故事俗說與久久自然成熟。由此，「日記故事」之稱，其意思也就不難理解：所指乃供日積月累講說，以使聽者讀者銘記於心的過往人、事。

其次虞韶推崇朱熹(1130-1200)《小學》的作法：

晦菴先生輯《小學》之書，以〈立教〉、〈明倫〉、〈敬身〉為

<sup>40</sup> 顧嗣立編，《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2，〈劉處士邊〉，頁85。

<sup>41</sup> 此篇序文末題「歲在辛卯正月歷[筆者按：同「歷」]畊老農書于草窗書圃」，首卷首頁標記「建安草牕虞韶以成纂集」，可知「草窗」為虞韶之號，「歷畊老農」即虞韶，「辛酉」當為元初至元二十八年(1291)。橋本草子，〈「日記故事」の版本について〉，頁44-45。

<sup>42</sup> 朝鮮本，〈小學日記序〉，頁1a。

之綱，既述〈稽古〉證於後，復廣之以〈嘉言〉，實之以〈善行〉，無非欲新學小生知立身行己之方，體日用常行之要。<sup>43</sup>

虞韶所見《小學》之佳處，在其前三篇〈立教〉、〈明倫〉、〈敬身〉陳說道理，後三篇〈稽古〉、〈嘉言〉、〈善行〉羅列事例。前者為教說的綱要骨幹，後者補充人物言行，賦予規範條文血肉生氣，提供立身行己具體之「方」，使幼年學童能在日常中「體會」，並藉由倣效以「體現」倫理之教。《日記故事》在各德性項目下，列以數則乃至十數則人物言行故事作為範例說明，無疑是進一步發展《小學》「廣之以嘉言，實之以善行」的作法。

取材編排上，書中故事「採摭傳記史籍」，宋代人物故事則取自朱熹所編撰之《名臣言行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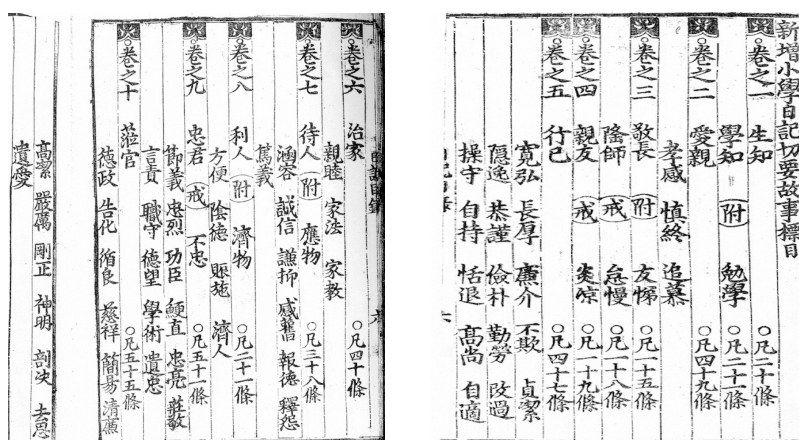
……取其有關於人倫，有裨於世教，可以終身行之者。如入則事親敬長，出則隆師親友，與夫行己治家，待人應物，以達於忠君。蒞官之際，一言一行，一是皆以聖賢行事為法條。分彙列輯成一編，授之童蒙，以資講習，使日誦之間，入耳着心，自少至老，終身受用。<sup>44</sup>

《小學日記》最初雖是為學童而編撰，在虞韶的構想中，學童與成人乃是同一套為學理想從進階到圓熟的連貫開展，並非切割分立的兩造。朝鮮本《日記故事》的分類，也與此構想高度相應：

43 朝鮮本，〈小學日記序〉，頁 1a。

44 朝鮮本，〈小學日記序〉，頁 1b。

圖1 《日記故事》朝鮮本(蓬左文庫藏)



資料來源：朝鮮本，日記目錄，頁6a-7a。

此書所立德性項目，從生知學知勉學、愛親、敬長友悌隆師、行己治家、待人應物、利人濟物到忠君蒞官，各類之下再分細項，由小而大，由修身到治世，以法聖賢為理想，但並不因對象為學童而收小格局，而是在文字敘述上予以簡化，同時著眼此書「日誦之間，入耳着心，自少至老，終身受用」綿延伸展的長期影響力。往後明代各本的分類，大致亦循此次第格局。序文末，虞韶展望此書的教化潛能：

但即是編訓誘之感，復歲以進，進于成人有造之域，則《大學》之誠正、脩齊皆自此致知入，他日治國平天下，亦莫不由是推之，又非但資《小學》而已也。求下學上達之功，當自此書始。<sup>45</sup>

虞韶設想結合教說道理(訓)與故事的吸引力(誘)使此書作為「壯行之基

<sup>45</sup> 朝鮮本，〈小學日記序〉，頁2b。

本」，<sup>46</sup>經年逐漸引領幼學「進于成人有造之域」。如是則《日記故事》不僅是《小學》之資，同時也是《大學》之始。誠如「日記」之名，既表達倫理之教的「日常」性，同時強調德性修養日日積累浸潤身心的「綿延」性。

內容揀擇上，虞韶特別指出當「詳酌去取」，使之「一歸於正」的必要，並說明：

如穎考叔輟羹遺母，雖不失純孝之名，而未免招君之過。鬻拳強諫以兵，雖可謂愛君之忠，而不逃陵上之罪。王覽愛兄諫母，雖足為敬長，而母則陷於不慈。鄧伯道存姪棄兒雖得為友愛，而已則傷於少恩。凡此矯枉害正之事，一切不取。<sup>47</sup>

這些「矯枉害正」例中，「鬻拳強諫以兵」緊扣君臣關係，特別凸顯「強諫」之舉在忠道論述中的爭議性。此事出自《左傳》莊公十九年(675 BC)，巴人攻楚，楚文王(689 BC-675 BC)帶兵抵禦巴軍，大敗於津地後回國。但鬻拳(?- 675 BC)不開門接納，送楚文王轉攻黃國。楚王敗黃國之軍於踰陵，然病死於回程途中，鬻拳將之安葬後，亦自盡身亡。發兵前，鬻拳另因事力阻楚王不果，最終以兵器相向，迫使楚王就範。事後，鬻拳自罪言：「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自刎其足。《左傳》記載給予鬻拳正面評價作結：「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sup>48</sup>「鬻拳強諫」故事背後，實連繫著自先秦以來對於君臣關係的論辯，篇幅所限非本文所能詳述。簡言之，鬻拳「凌上」，其背後的理據在於置社稷福祉高於君主。身為安邦有責的楚國大夫，當君主意願與國家利益衝突時，鬻拳以維護後者為優先，是以忠於社

46 朝鮮本，〈小學日記序〉，頁 1b。

47 朝鮮本，〈小學日記序〉，頁 2a。

48 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210-211。

稷。<sup>49</sup>身為楚王之臣，鬻拳自認「懼君以兵」大罪，自刎自罰，乃至最後自盡殉君，以償其過。前者是大公之忠，後者是以自罰償還為行大忠而對君主個人造成的傷害。是故《左傳》評贊其「愛君」，肯定鬻拳透過自罰自盡自我犧牲，既保固了社稷使國君行善策，且在情義上殉死相報無負君上。

儘管據此理路分析鬻拳可謂「愛君」，然而如此強勢決絕的「兵諫」，仍不無可議之處。如就荀子(約 313 BC-238 BC)的政治社會理論觀之，據佐藤將之分析，荀子的構想以「忠信」、「仁義」、「禮義」為最高價值，以人君有責於民，君臣互重為根本原則，一方面強調君德「致忠信」的重要性，一方面分判人臣「作忠」的三種等級：「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sup>50</sup>這套政治思想藍圖認為理想「人臣」的關鍵在於「變化」與「和諧」，是由臣下來主導主上的「起偽化性」功夫。<sup>51</sup>《左傳》敘事只記錄了鬻拳強諫，楚文王被迫依從的結果，未言其舉是否「怒君」。然而「兵諫」與自殘自盡皆屬極端，與和諧導引之理想相去甚遠，無怪荀子〈臣道〉篇中的「忠德」典範人物不見鬻拳。

時至宋代，楊萬里(1127-1206)、張栻(1133-1180)、呂祖謙(1137-1181)、朱熹對「鬻拳兵諫」皆提出批評。<sup>52</sup>虞韶刪去鬻拳故事，與南宋此一思路的

<sup>49</sup> 關於先秦對於「忠」的對象落於社稷抑或君主的論辯，及其歸屬「君德」或「臣德」的思想演變，參見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

Yuri Pines, "Friends or Foes: Changing Concepts of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and the Notion of Loyalty in Pre-Imperial China," 35-74.

<sup>50</sup> 王先謙，《荀子集解》(新北：藝文印書館，1988)，卷9，〈臣道〉，頁6a。

<sup>51</sup> 參見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頁139。

<sup>52</sup> 楊萬里，《誠齋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3，〈張先生校楊寶學易傳上經〉，頁18a。張栻，《南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發展又復關聯。如呂祖謙在《左氏博議》中評論「鬻拳兵諫」，以當時一般之見開篇：「首人君之惡者拒諫」，故「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而後隨即反駁此說，提出「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認為人臣所應盡心努力者，在於思考、精進一己「諫君」的方法能力，而非徒費精神憂慮個人所無法控制的「人君拒諫」的狀況。呂祖謙不諱言：

諫之道，難矣哉！誠之不至，未善也；理之不明，未善也；辭之不達，未善也；氣之不平，未善也；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sup>53</sup>

從誠意、明理、達辭到言行取信於君，此「諫之道」幾乎是一種必須兼備修養功夫與修辭技巧的藝術，其「難」有自。然而亦唯有如此以「導君」為目標的「諫之道」才是治平之基，人臣應當用心之所在。若人臣盡力諫言，君主弗聽，則臣職已盡，可以效孔子(551 BC-479 BC)諫魯侯，孟子(372 BC-289 BC)諫齊王求去。相對而言，鬻拳「強君而使必從」乃「越其職」，幾已游走在忠、逆邊緣，略有差池便可能導致「解國」大患。呂祖謙如此設想：

當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幸楚子不以為忤耳。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使是時不幸為楚子所誅，則陷於逆亂，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sup>54</sup>

第 11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31，〈答周允升〉，頁 8a。朱熹撰，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34，〈歷代一〉，頁 3211。

<sup>53</sup> 呂祖謙，《左氏博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7，〈鬻拳兵諫〉，頁 19a。

<sup>54</sup> 呂祖謙，《左氏博議》，卷 7，〈鬻拳兵諫〉，頁 20a-b。

鬻拳脅迫式的勸諫方式，在呂祖謙看來魯莽不智，殊乏深謀遠慮，既危及自身，又造成邦國不安。以刀兵脅迫再自殘自罰之舉，是「壞於前而收於後，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焦然不寧」。<sup>55</sup>明初方孝孺論鬻拳更進一步以「兵諫」大患作結：「劫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sup>56</sup>可以推測虞韶剔除鬻拳，對於後出的《日記故事》產生相當影響，筆者目前寓目的十數部明清版本中，皆不見鬻拳故事。

### 三、分類與典型

那麼，是哪些人物事蹟在《日記故事》中被樹立為忠臣典範？我們借助朝鮮本中收錄管昉所撰之〈小學日記切要故事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先檢視「忠君」故事之下的次類目與全書分門佈局之間的大致關係，再進入故事內容。〈提綱〉分四部分說明各故事群類之要義：首先「生知」、「學知」與「勉學」為一大類，以「學而致知」為這類故事要旨。其次「愛親」、「敬長」、「友悌」、「隆師」、「親友」為一大類，管昉引《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sup>57</sup>說明此類故事目的在啟迪人心孩提時期愛親敬長的良知良能。第三「行己」、「治家」、「待人」、「利人」為一大類，以「家之本在身」，<sup>58</sup>「大人正己而物正

<sup>55</sup> 呂祖謙，《左氏博議》，卷7，〈鬻拳兵諫〉，頁20b。

<sup>56</sup> 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5，〈鬻拳〉，頁5a。

<sup>57</sup> 趙岐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卷13上，〈盡心上〉，頁359。

<sup>58</sup> 趙岐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卷7上，〈離婁上〉，頁192-193。

者也」，<sup>59</sup>說明此類涵蓋修身齊家待人應物之法則。最後「忠君」類引「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sup>60</sup>統言「蓋學求為有用者也」，界定此類之下的故事體現《大學》功用「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目標。

編者將「忠君」故事置於全書最末兩卷。其中卷9「忠君」以下再細分次類，依序為：節義、忠烈、功臣、鯁直、忠亮、莊敬、言責、職守、德望、學術、遺忠，此卷中故事大體環繞朝廷中央君臣互動及人臣出使、征戰之事蹟。卷10「蒞官」以下分為：德政、告化、循良、慈祥、簡易、清廉、高潔、嚴厲、剛正、神明、剖決、去思、遺愛，全卷以人臣治理地方實施善政，居官愛民百姓感戴的故事為核心。由此可知朝鮮本中的「忠君」概念由死節、忠諫、善政三部分構成，往後明代各本《日記故事》大致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日記故事》死節、忠諫、善政三部分的排列順序與各本中故事比例的變化。若我們以唐宋時期問世的《忠經》作為比對指標，<sup>61</sup>此書共18章，首章〈天地神明〉提出總綱、次章〈聖君〉專言君道之忠，第三章〈冢臣〉定位臣道，首先便立其大旨：「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而已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sup>62</sup>此後第七章言王者武備及戰場上統帥帶兵盡

<sup>59</sup> 趙歧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卷13上，〈盡心上〉，頁361。

<sup>60</sup> 趙歧注，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卷2下，〈梁惠王下〉，頁53-54。

<sup>61</sup> 《忠經》年代有唐或宋代二說，詳見劉瓊云，〈天道、治術、商品——《忠經》之出版與明代忠文化〉（收入李爽學、胡曉真主編，《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2015），頁318-319。

<sup>62</sup> 陶原良詳解，《忠經詳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冢臣章第三〉，頁3a-b。



忠「致其命」之必要；<sup>63</sup>第十五章論〈忠諫〉類似前論呂祖謙等人的思路，推揚和平諫言，以死亡衝突為末，<sup>64</sup>以死諫、死節為「非常」情況；「沉謀潛運，正國安人」，維持中央到各級地方政治清明平順運作，才是保障社稷安寧的忠道之「常」。

回頭觀察朝鮮本《日記故事》，展讀「忠德」類目，最先進入讀者眼簾的，則是一連串人臣死節的典範。從戰國王蠋「不事二君」到明代何忠「罵賊被害」首 23 個故事，除了魏徵(580-643)「願為良臣」與王尊「稱為忠臣」，其餘 21 則皆聚焦於忠臣與政權敵對陣營間的對抗，大致對應忠道的「死節」面向。接著「鯁直」、「言責」與「遺忠」類史魚「死猶屍諫」共 10 則「忠諫」故事，為卷 9 第二大宗故事群；餘者與卷 10 中的 55 個事例則對應「忠道」下的「善政」面向。相對於《忠經》強調寧和理政之「常」，朝鮮本的編排優先呈現戰爭衝突下的忠節典範，而置「善政」敘事於末，但在故事數目上確保後者的「能見度」。有趣的是，在許多晚明《日記故事》中，「善政」典範的故事將大幅縮水至 20 則以下，而「死節」與「忠諫」故事的內容與數目則大致維持如朝鮮本中的規模，占據「忠德」故事頭版，成為當中最顯眼的兩大主題。<sup>65</sup>(附表 1)<sup>66</sup>何以如此？以下我們檢視這兩類主題的敘事特徵。

<sup>63</sup>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統軍之帥，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荊[筆者按：當為「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陶原良詳解，《忠經詳解》，〈武備章第八〉，頁 6b-7a。

<sup>64</sup> 「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陶原良詳解，《忠經詳解》，〈忠諫章第十五〉，頁 12a。

<sup>65</sup> 由於篇幅所限，且本文目的在探討《日記故事》「忠德」呈現與近世「忠」文化趨向暴力兩者間的可能關係，故下文討論將以「忠諫」、「死節」兩大類故事為主，討論「善政」類故事需留待以後。

<sup>66</sup> 附表 1 參見新史學雜誌社網站：劉瓊云，〈附表 1 各本《日記故事》忠

### (一) 忠諫——進退之間

將 10 則「諫諍」故事分列如下，不難看出這些故事聯繫著前文所論虞韶對「鬻拳兵諫」事的顧忌，形成「身諫」與「言責」，「激烈」與「節制」的對比。

#### 鯁直

(漢) 朱 雲 〈攀折殿檻〉

(後漢) 申屠剛 〈頭軼輿輪〉

(唐) 陽 城 〈欲壞相麻〉

(宋) 馬正惠 〈幾擊同列〉

#### 言責

(晉) 傅 玄 〈簪帶不寐〉

(宋) 陳 恕 〈斂板復奏〉

(宋) 趙 普 〈補奏復進〉

(宋) 劉安世 〈號殿上虎〉

(宋) 魯宗道 〈題曰魯直〉

#### 遺忠

(衛) 史 魚 〈死猶屍諫〉

朝鮮本中以朱雲、申屠剛、陽城(736-805)、馬正惠(955-1019，[筆者按：馬正惠，原名知節，諡號正惠])作為不同程度鯁直之忠的範例。朱雲直諫觸怒漢成帝(33 BC-7 BC 在位)，帝下令將之強壓出殿，朱雲「攀殿檻，檻折」。<sup>67</sup>申屠剛勸諫漢光武帝(25-57 在位)不宜出遊不果，將頭置於光武

德條目一覽表〉，[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Chiung\\_yun\\_Liu\\_table1\\_newhistory\\_30\\_3.pdf](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Chiung_yun_Liu_table1_newhistory_30_3.pdf)，擷取日期：2019 年 9 月 25 日。

<sup>67</sup> 事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67，〈楊

帝座車輪下阻其前進，帝遂止。<sup>68</sup>兩人事蹟皆透過諫言的激烈性，表現忠臣擇善固執，堅持甚至驅迫君王必須持守正道。不同於鬻拳取兵器相向於君王，朱雲、申屠剛以己身赴險，「凌上」之爭議性相形減弱。但即使如此，攀折殿檻、頭軻輿輪仍是揚聲使氣，侵犯君王殿檻、車輿的激烈舉動，故如班固(32-39)、呂祖謙對朱雲折檻諫諍仍有微詞。<sup>69</sup>人臣忠諫的敘事，有無其他可擺落激進形式，同時維持臣下不屈從於皇權，表現正直風骨的可能？

一個早期的經典範例是史魚屍諫。史魚勸諫衛靈公(534 BC-493 BC 在位)應進用賢人蘧伯玉，退黜不適任的彌子瑕，靈公不納。史魚將卒：

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sup>70</sup>

史魚與朱雲以「身」行諫的方式皆援引死亡為助力。朝鮮本中朱雲故事結束在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sup>71</sup>以竭力致命無懼死亡的宣告，揚升其抗爭力量的強度；直諫臣衝撞式的「忠」行，具顯在斷裂之殿檻。然而相對於朱雲激烈進犯的肢體動作，史魚安

---

胡朱梅云傳》，頁 2915。

<sup>68</sup> 事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29，〈申屠剛鮑永鄧恢列傳〉，頁 1016。

<sup>69</sup> 班固批評朱雲「犯上」，呂祖謙評論鬻拳事言：「牽裾折檻已為下策，況動干戈於君側耶？」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卷 100，〈朱雲傳〉，頁 4249。呂祖謙，《左氏博議》，卷 7，〈鬻拳兵諫〉，頁 21a。

<sup>70</sup> 朝鮮本，卷 9，〈死猶屍諫〉，頁 21a。

<sup>71</sup> 朝鮮本，卷 9，〈攀折殿檻〉，頁 12b。

排「死」與「諫」的方式大異其趣，乃透過其靈柩錯位擺放，傳達「未能正君，臣靈不安」之意，賦予靜定屍體死而不已，移易君心的力量。這裏諫臣忠行的焦點——死屍靈柩，透過非禮之位和史魚遺言，雖死猶生，雖靜能動，行「感化」之道。史魚屍諫固然得到孔子讚賞，然而從朝鮮本中的其他忠諫故事，可看出編者亦費心呈現「諫」而無「死」之典範。陽城「欲壞相麻」與馬知節「幾擊同列」兩則故事，是另一種調和傾向的事例。唐德宗(779-805 在位)欲立裴延齡(728-796)為相，然延齡先前誣逐陸贄(754-805)，陽城極論延齡不可立。「德宗不聽……城顯言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伏閣不去。」<sup>72</sup>白麻，書立宰相冊命之紙。此處陽城所言將損壞冊命裴延齡為相公文的舉動，類同朱雲折檻與申屠剛軛輪，亦屬急進式的諫諍。不同的是，陽城僅止於事先「揚言」而未行動。敘述中實際的動作，是「哭於庭伏閣不去」；「進犯」的衝動與「伏閣哭於庭」之間，透露出陽城欲奮進力爭，又不願干犯朝儀辱君的遲疑。相對於正史記載陽城「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力也」，<sup>73</sup>朝鮮本的敘事未及陽城諫止成功的結果，而收束在「哭於庭」，並加入了「伏閣不去」四字，更突顯了陽城「哭而不去」，欲行動卻抑止復又流連，進退之間的拉鋸。馬知節故事亦展現了類似思動而未行的節制。宋真宗(997-1022 在位)朝王欽若(962-1025)攬權，奏事往往只出一、二，其餘奏章匿於懷中，退朝後「以己意稱聖旨行之」。馬知節以此詰欽若，隨後見當時宰相王旦(957-1017)，詞色尚怒，語之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恐驚動君相爾。」<sup>74</sup>馬知節此乃事後之言，並非預言，然與陽城事例類似的是，無論事前事後，

<sup>72</sup> 朝鮮本，卷9，〈欲壞相麻〉，頁13a。

<sup>73</sup>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94，〈陽城傳〉，頁5570-5571。

<sup>74</sup> 原文夾註：「諸子指欽若輩。」朝鮮本，卷9，〈幾擊同列〉，頁13b。

撕毀白麻與擊死同僚都是兩人「說」、「想」而未行的舉動。「撕毀」和「擊死」標誌忠臣之忿氣，起心動念而身止，傳遞忠臣的自我節制。

不過陽城與馬知節事例在往後的《日記故事》中並不常入選。更受後來編者青睞的，是與激烈身諫恰成對比，朝鮮本「言責」下的「冷靜型」宋代諫諍故事：陳恕(945-1004)峭直守公，奏事引宋太宗(976-997在位)不悅時，便「蹴踏斂板，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sup>75</sup>趙普(922-992)與宋太祖(960-976在位)任人意見不同，太祖屢退其請，趙普復奏，直至「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神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sup>76</sup>劉安世「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伺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至以俚語目公曰「殿上虎」。<sup>77</sup>

三則故事所表現的都是正直敢言，面對盛怒君王，冷靜以待，堅持不懈的諍臣。相對於前論情緒高昂的諫諍，三位名臣人物神情或恭敬不安，或顏色自若，但身體動作皆以「退止」為歸趨。陳恕「退至殿壁負牆而立」；面對遭宋太祖力擲於地故而壞裂的奏書，趙普「徐」拾之而「歸」；劉安世則是「執簡卻立」，靜候天顏稍霽。而其「退」與「止」，都只是暫時，最終目的在等待下一波「進言」的時機。「且前且卻」三、四、五次的往復，同時也是君臣意志拉鋸，忠臣擇善固執，不屈於君王威勢的表現。

趙普「補奏復進」、劉安世「號殿上虎」、朱雲「攀折殿檻」及史魚「死猶屍諫」，將脫穎而出成為往後明代《日記故事》中最常見

<sup>75</sup> 朝鮮本，卷9，〈斂板復奏〉，頁16b。

<sup>76</sup> 朝鮮本，卷9，〈補奏復進〉，頁16b-17a。

<sup>77</sup> 朝鮮本，卷9，〈號殿上虎〉，頁17a。

的「忠諫」典範。此四則故事皆環繞意見相左君臣之間的角力拉鋸，在身動與言責、激進與靜退之間，各成一種典型。於此我們看到編者表現「忠諫」之道，大致畫出的範圍界線與當中的選項漸層，其最烈者為朱雲，最平和靜定則屬趙普。這些敘事皆以「衝突與和解」為基本結構，透露著忠德內部固有的君臣緊張關係，以及編者調和的努力：一方面透過「衝突」突顯人臣不屈從於皇權，盡忠職守，剛正無畏之忠，另一方面多以「和解」收束敘事，留心維持君臣職分相互間的平衡。尤值得注意的是，朝鮮本朱雲故事收束在「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一語，<sup>78</sup>言下之意是將漢成帝比為夏桀、商紂兩位暴君。其他《日記故事》編者多半也注意到了當中的問題，因此他本中的「折檻」敘事往往另作剪裁，加上了衝突事件後續：「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曰：『此臣狂直，當容之。』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sup>79</sup>如此，另一位良臣辛慶忌(?-12 BC)的介入與成帝的大度將敘事帶到和解收場；斷裂的欄杆得到修補，修補的痕跡留置大殿原處作為君臣納諫直言的提醒。

## (二) 節義之忠——身體、言辭、暴力

如果說，忠諫必以君、臣為進退角力的兩端，其故事必然以君、臣互動為焦點，那麼節義故事的基本架構，則將衝突轉向忠臣與政權敵對陣營間的對抗。相對於忠諫故事中和解的必要，戰爭、暴力或死亡，往往是忠節故事必然的收場。朝鮮本卷 9 的節義和忠烈類故事，對於我們理解通俗忠觀的節烈內容，提供了一種結構性排列。而在這兩個故事次類之前，此書先在「忠君」大類下安排了 7 個故事作為概說：

<sup>78</sup> 朝鮮本，卷 9，〈攀折殿檻〉，頁 12b。

<sup>79</sup> 劉龍田本，卷 7，〈攀殿折檻〉，頁 309-310。

忠君

(齊)王 蠋	〈不事二君〉
(晉)豫 讓	〈報以國士〉
(漢)王 陵	〈戒持二心〉
(漢)王 尊	〈稱為忠臣〉
(晉)周 處	〈安得為子〉
(唐)魏 徵	〈願為良臣〉
(宋)文天祥	〈忠孝感天〉

節義

(趙)藺相如	〈全璧歸趙〉
(漢)蘇 武	〈杖節牧羊〉
(後漢)鄭 眾	〈拔刀恐虜〉
(唐)張巡、許遠	〈分城死守〉
(唐)顏杲卿	〈瞋目罵賊〉
(唐)顏真卿	〈叱賊被害〉
(唐)段秀實	〈奪笏擊賊〉
(唐)孫 揆	〈罵賊至死〉
(唐)盧 奕	〈罵不空口〉
(唐)蔡廷玉	〈辱無撓辭〉
(宋)謝枋得	〈從容就義〉

忠烈

(宋)趙鼎發	〈節義成雙〉
(宋)江萬里	〈與國存亡〉
(皇明)何 忠	〈罵賊被害〉

首 7 則故事，既標舉魏徵致唐太宗(626-649 在位)「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之論，申言「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

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sup>80</sup>亦推揚如王蠋、周處(236-297)、文天祥(1236-1283)等死難忠臣，初看似題旨不一。然作為「忠君」事類的總綱概說，此數則故事的分歧性，也正點出忠德的多面性。可以說，魏徵之論著眼良臣的廉政之德，安民之才與治世之能，所對應的事例便是死節、忠諫之外的善政故事。

其他 6 則故事，首則王蠋事，其精要在於燕軍破齊，因君王不聽諫而退耕於野的齊國大夫王蠋，面對燕王禮聘，推拒死節前所發的名言：「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sup>81</sup>第二則豫讓(?-445 BC)復仇事，乃「士為知己者死」，殺身以報知遇之恩的典型。接著三則故事，一再強調忠孝難全，大孝為忠的概念。王陵(?-180 BC)「戒持二心」講說楚漢相爭，項羽(232 BC-202 BC)欲延攬王陵，俘虜陵母相脅。陵母為使王陵一心事漢斷絕歸楚之念，在楚營中伏劍而死，死前泣託漢王劉邦(256 BC-195 BC)來使帶話予王陵：「善事漢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sup>82</sup>王尊〈稱為忠臣〉故事發生在蜀郡以山路險曲著稱的岷山九折阪。先前孝子王陽任益州刺史，經此處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承此險？」。其後王尊任益州刺史亦經此處，驅馬而過自言「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sup>83</sup>周處「安得為子」講西晉周處強直，為朝中同僚陷害，受命討伐氐戎叛軍。此乃必死之戰，孫秀(?-301)勸周處以家中老母為由辭免西征，周處答：「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事君，父母安得為子乎？」<sup>84</sup>果力戰而沒。

進入之後 14 則「節義忠烈」故事，是一連串敵我交鋒，充斥戰爭暴力的敘事。這些故事亦可如前論之「忠諫」典型，可分為「冷」「熱」

80 原書為「取」，筆者據《新唐書·魏徵傳》改為「此」。

81 朝鮮本，卷 9，〈不事二君〉，頁 1a。

82 朝鮮本，卷 9，〈戒持二心〉，頁 2b。

83 朝鮮本，卷 9，〈稱為忠臣〉，頁 3a。

84 朝鮮本，卷 9，〈安得為子〉，頁 3b。



兩種模式。前者仍以宋代人物為代表：謝枋得(1226-1289)〈從容就義〉、趙鼎發(?-1275)〈節義成雙〉、江萬里(1198-1275)〈與國存亡〉，三人分別絕食、自縊、自沉而死；一言以蔽之，三則敘事共同意蘊在於「從容」二字，避開了敵我激烈衝突的場景。相對而言，後者敘事焦點落在雙方衝突的頂點。在少數的例子裏，節臣或義正嚴詞(藺相如、蔡廷玉)，或拔刀相脅而得以全身而退(鄭眾[?-83])。多數事蹟中，忠臣堅決拒降不惜流血抗爭，不屈而死。如段秀實(719-783)先佯與反賊朱泚(742-784)配合，見幾舉笏攻擊朱泚使之額破「流血巖面匍匐走」，自身為朱泚手下所殺；或如遭擒受制的顏杲卿(692-756)「瞋目罵賊」、顏真卿(709-785)「叱賊被害」、孫揆(?-891)「罵賊至死」、盧奕「罵不空口」、何忠「罵賊被害」。這些遭擒不降的忠臣僅剩眼神之威與口舌之聲，敵我交鋒於是聚焦在忠臣瞋目揚聲義責叫罵。面對反賊的刀兵刑戮，「罵賊」的行動與言詞，成為忠臣的表徵之一，而與「罵賊」並行的，往往還有賊子施加於忠臣的身體暴力。

這些「節義」故事往往以「華夷」爭戰為背景：漢代的鄭眾與蘇武(140 BC-60 BC)面對匈奴，唐代顏杲卿、顏真卿、盧奕、張巡(709-757)、許遠(709-757)面對安祿山(703-757)或其部屬，孫揆面對沙陀李克用(856-908)，宋代謝枋得、趙鼎發、江萬里面對元臣元軍，明代何忠(?-1426)面對越南黎利(1385-1433)。就故事本身而言，這些敘事聚焦戲劇性時刻，無論激烈抗賊或從容赴死，各有其刺激感觸讀者之效。就時代背景而言，這些故事脫穎而出，或許與《日記故事》的編纂歷史不無關係。此書初編於宋元易代後不久，朝鮮本中明代弘治年間的管昉〈提綱〉內一條「凡例」，復次說明弘治年間編者增補的方向：

宋之忠臣孝子碩儒賢士多矣，然賢而隱逸與宗社垂亡節義大臣未入，今則增之。惟元之忠臣則不增入。蓋元乃胡人亂華，中國之人仕元言忠者，皆不得為忠也。若元社垂亡之臣，有歸輔聖朝者，不為失節。何則？蓋我太祖高皇帝乃天縱之聖，掃清

六合，正綱常於幾絕，為萬代帝王增光故也……。<sup>85</sup>

此條「凡例」重點有二。其一，元初《日記故事》取材自史傳與宋代《名臣言行錄》，但未及宋代「隱逸與宗社垂亡大臣」，故於此加以增補。其二、視元代為胡人亂華，中國之人仕元者不得為忠。如此嚴於分別胡漢的心態，與歷史學者注意到土木之變後，明中期史家對元朝敵意轉深，「華夷之防」種族思想漸興的現象相呼應。<sup>86</sup>管昉大加稱揚明太祖(1368-1398在位)「正綱常於幾絕」之功，乍看似乎不外是士人宣揚「官方意識型態」與「保守僵化的儒家觀念」的老調重彈，<sup>87</sup>然而倘若回到元初與明中葉蒙、漢政權緊張衝突的歷史情境下，士人面對異族，欲藉《日記故事》忠節故事的編選，保存傳承儒家核心價值並建立「我族」文化認同(identity)的心理危機與社會責任感，亦不難理解。當然，隨時勢移易，華夷觀的內涵可能變化，<sup>88</sup>往後不同版本的編者亦未必皆抱持同樣心態，然而從熊大木本與朝鮮本兩書共有的「節義」故事來看，它們確實形成了重要的「節義忠臣典範」結構模式，大致為往後各本《日記故事》所依循。

這類「罵賊」故事中，最常為晚明各本《日記故事》選入的，是暴力敘述最為聳人耳目的顏杲卿、孫揆以及張巡、許遠。先談前兩者：

顏杲卿，性剛正。祿山反，急攻城。杲卿日夜戰，井渴糧盡，六日而陷。賊脇使降，不應。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

<sup>85</sup> 朝鮮本，〈小學日記序〉，頁 4b-5a。

<sup>86</sup> 傅范維，〈從〈諭中原檄〉的傳鈔看明代華夷正統觀的轉變〉，《明代研究》，22(臺北，2014)，頁 51-76。

<sup>87</sup>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頁 195、201。

<sup>88</sup> 如劉龍田本的臣道故事收錄了元代忠臣關文興及其妻王醜醜事，另一則「剖心停鞠」故事當中拯救當時太子李旦(唐睿宗)的安金藏則為中亞胡人，透露此本納入胡人典範有別傳統的編輯策略。

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邪？」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糊而絕。<sup>89</sup>

孫揆，字聖圭。昭宗討李克用，以揆本道兵會戰。克用伏兵執揆，而將用之。揆大罵不屈。克用怒，使以鉅[鋸]解之。鉅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詈聲不輟至死。<sup>90</sup>

這是充斥感官刺激，標榜自我犧牲受難式的英雄主義文字。忠臣「罵賊」言語激怒對方，招致酷刑相向，似乎其所承負的暴力愈慘烈，愈彰顯浩然之氣強健不息。如此雖敗於一役，透過無懼承受極刑，仍能震懾敵方。這裏烈士的身體成為忠節的展示場，也是敵我爭鬥又一角力場。罵賊受刑的節義忠臣敘事，依傍的是一種轉化可見的身體痛楚成為精神力量，化「敗」如「未敗」的符號意義運作。

#### 四、圖像與變化

除了文字符號的運作，朝鮮本中顏杲卿、孫揆與張巡、許遠三則故事中的文圖關係，進一步透露編者「教忠」時面對的問題與解決的方式。為求更清楚顯示其間的落差變化，在此借助性質與《日記故事》相當接近的元刊《君臣故事》，作為對照。<sup>91</sup>顏杲卿、孫揆與張巡事

<sup>89</sup> 朝鮮本，卷9，〈瞋目罵賊〉，頁6b-7a。

<sup>90</sup> 朝鮮本，卷9，〈罵賊至死〉，頁8a。

<sup>91</sup> 據朝鮮人漢語學習教材《老乞大》記載，為高麗王室服務的商人，其中國購書單上，《君臣故事》與《資治通鑑》、《標題小學》、《貞觀政要》、《三國志平話》諸書並列。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頁142、620。關於《君臣故事》內容的介紹分析，可參見 Chiung-yun Liu, “Embodied Virtue: How Was Loyalty

收入《君臣故事》「臣道門」下「忠義」故事。<sup>92</sup>兩書中顏、孫故事文字大體相同，差異之處在於故事的標題。同樣的敘事，《君臣故事》分以「縛柱節解」和「束板鋸解」為標題，強調忠臣身體受縛被刑的樣態。朝鮮本則取「瞋目罵賊」和「罵賊至死」為題，將焦點轉移至忠臣主動義責批判，而非被動受難。兩書呈現同一事件的圖像，《君臣故事》圖中，下令行刑的敵方將領，相對於赤裸袒露受縛的忠臣，無論在衣著服飾、尺寸與氣勢上都占據優勢(附圖 2)。朝鮮本則試圖調整，當中觀刑將領不復見於兩則故事圖像內，忠臣與行刑者成為觀者視覺的焦點(附圖 3)。

不過若將這些忠臣故事圖像與地獄圖略作比較，便可發現朝鮮本的努力未竟全功，仍然未脫借地獄酷刑的圖像模式表現忠臣節烈的過渡階段。上述兩組圖像，特別是孫揆「束板鋸解」(附圖 2)受刑體態的描繪，與學者對於宋代四川摩崖造像《大方廣華嚴十惡品經變》中「鋸解地獄」的描述，極為相似：「圖中一人被倒吊在架上，兩腿中嵌入一大鋸，一牛頭獄卒和另一獄卒分別執鋸兩端，用力拉之。」<sup>93</sup>朝鮮本中標題改為「罵賊至死」的同一孫揆故事，圖中固定人體的單板改為雙板(附圖 3)，類似的「鋸解地獄」表現格套，到晚明《唐鍾馗全傳》

---

Edited and Performe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Keyword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Literature* (forthcoming).

<sup>92</sup> 《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收「忠義」類故事 6 則，依序為(唐)顏杲卿〈縛柱節解〉、(唐)孫揆〈束板鋸解〉、(北宋)劉韜〈酌酒自經〉、(後梁)王彥章〈受恩自殺〉、(唐)〈林蘊磨頸〉、(唐)張巡〈張巡抉齒〉。此書元代五山版《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收藏於日本尊經閣文庫，另有覆元刊本收藏於東洋文庫(筆者所見)及和刻本(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立庵訓點，《君臣故事》(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 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sup>93</sup> 胡文和，〈四川摩崖造像中的《大方廣華嚴十惡品經變》〉，《敦煌研究》，1990：2(蘭州，1990.5)，頁 18。

中的地獄圖像中仍然沿用(附圖 4)，<sup>94</sup>可見較早期道德故事類書中，忠臣遭受酷刑與地獄圖像格套有其重疊之處。<sup>95</sup>

朝鮮本編繪者很可能意識到凸顯暴力「表忠」，文字與圖像媒介的作用效果有別。這當中主要的問題在於，忠臣的言語聲氣，難以透過圖像傳遞。兩則故事中，與顏杲卿和孫揆所受酷刑激烈對抗的，正是兩人對反賊的怒罵，乃至「營州牧羊羯奴」、「死狗奴」的辱罵。但是在長於表現肢體動作，而短於「傳聲」的圖像中，忠臣罵賊的力量消解於其中。於是一方面，圖像可以輔助文字，將每則敘事中定義忠臣所以為「忠」的關鍵畫面、舉動，形之於紙上；標題、敘事、插圖相互配合，印記種種典範事例於觀者「心目」之中。另一方面，文字與圖像所能承載的暴力密度與表現方式畢竟不同。如何透過插圖推揚節義，避免過度暴力而矮化忠臣之死，朝鮮本中的張巡故事可視為另一種嘗試。

張巡故事插圖的表現，是與其內容的改動一併進行的。《君臣故事》中，〈張巡抉齒〉與〈縛柱節解〉、〈束板鋸解〉皆屬「罵賊受刑」的敘事模式。尹子琦攻破睢陽城，與張巡如下問答：

子琦謂巡曰：「聞君督戰，輒背血面，嚼齒皆碎，何至如是？」

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齒。巡

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彘也。」<sup>96</sup>

書中於〈張巡抉齒〉標題下註事出《唐本傳》，罵賊、抉齒自宋代以降也確為張巡忠義事蹟的重要標誌。<sup>97</sup>

<sup>94</sup> 不著撰人，《唐鍾馗全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第 19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不詳，據劉雙松刊本影印)，卷 3，頁 96、117。

<sup>95</sup> 此點觀察，特別感謝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許雅惠教授提點。

<sup>96</sup> 立庵訓點，《君臣故事》，卷上，頁 18b。

<sup>97</sup> 例子頗多，在此僅舉如蘇軾「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根，顏平原，餐不忘君握拳透爪」；陸游「阨窮蘇武餐毡久，憂憤張巡嚼齒空」；錢謙益「嚼張巡之齒牙，曼聲長吟；握魯公之拳爪，運筆核飛」。蘇軾，《坡仙集》(中研

但朝鮮本中的張巡故事納入許遠，不用「罵賊抉齒」敘述，改選擇睢陽城中糧盡，全城上下盡命守城一段，摘錄《資治通鑑》文字，題為〈分城死守〉：

至德中，安祿山子慶緒為亂，尹子奇以兵圍睢陽，太守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與遠分城而守之……。睢陽食盡，與士卒同食茶紙代糧。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女食之。既盡，繼以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五十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巡自死顏色不亂，陽陽如常。<sup>98</sup>

學者研究已指出張、許食人死守在當時的爭議性，並分析肅宗(756-762在位)何以最終決定下詔表彰二人。<sup>99</sup>張巡友人，也是當時翰林學士李翰所撰〈進張巡中丞傳表〉、韓愈(768-824)〈韓愈張中丞傳後敘〉、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的記述為張、許之忠定調，整體而言從張巡人品才略、情勢所迫無可如何、以及守城之功持論。張巡「博通羣書，曉戰陣法」，任清河縣令時「治績最，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

---

院傳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焦竑刻本)，卷11，無篇名，頁20a。陸游，《劍南詩稿》(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388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卷35，〈書憤〉，頁25b。錢謙益，《牧齋有學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7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卷16，〈浩氣吟序〉，頁14b。

<sup>98</sup> 朝鮮本，卷9，〈節義〉，頁6a-6b。

<sup>99</sup> David A. Graff, "Meritorious Cannibal: Chang Hsün's Defense of Sui-yang and the Exaltation of Loyalty in an Age of Rebellion,"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8:1 (1995): 1-17.

傾貲振護無吝」，<sup>100</sup>此其人品才識。張、許初守時，意支撐時日將得鄰近同朝將領引兵救援，未料朝廷無力，眾將觀望，加上原初城中可支給一年的存糧，河南節度使虢王李巨強令析其半予濮陽、陰濟二郡，以致張、許守睢陽十月，最終糧盡。時間點或許是守城抗戰期間最難的抉擇。堅持多久？何時棄守？睢陽城內六千八百士卒與尹子奇十三萬大軍相抗，張、許戮力守城指望援軍；援軍未到而糧盡，此時即欲撤守，饑民疲兵恐不免仍死於道路鐵騎之下，未必能全身而退，此即韓愈所論：「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sup>101</sup>明清之際陳孝逸(1616-?，陳際泰[1567-1641]之子)亦循此思路言：「雀鼠也，奴妾也，百姓之命也，勢無可如何也。而賀蘭進明既觀望已矣，節度鎬抑又不及已矣，<sup>102</sup>苟不食人，盡民均死者。城之陷，其初豈料此乎？」<sup>103</sup>此其無可如何。就事功言，《新唐書》概括「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sup>104</sup>故李翰力論若「眾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紕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

<sup>100</sup>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192，〈張巡傳〉，頁 5534。

<sup>101</sup> 韓愈撰，朱熹考異，《昌黎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集部，第 96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據涵芬樓藏元刊本影印)，卷 13，〈張中丞傳後敘〉，頁 4b。

<sup>102</sup> 因繼任李巨為河南節度使的賀蘭進明觀望不馳援睢陽，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賀蘭進明節度河南，張巡「亡三日而鎬至。」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192，〈張巡傳〉，頁 5540。

<sup>103</sup> 陳孝逸，《痴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卷 4，〈張巡論〉，頁 7b-8a。

<sup>104</sup>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 192，〈忠義中〉，頁 5544。

以刑怨情，善過惡揚，錄瑕棄用」，<sup>105</sup>其結果將無以激勵將帥為已成分崩之勢的唐帝國效力，大不利於維繫帝國命脈。

儘管張、許人品、才幹、事功皆高，然而以食人作為死守救國的代價，終為可議，清代的王夫之(1619-1692)、王士禎(1634-1711)、袁枚(1716-1797)對此直接或間接批評。<sup>106</sup>在此之前，死守睢陽烈忠背後的駭人慘絕，長期以來仰賴宗教力量予以安頓。敘事中張巡赴死前「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之言，既顯其忠死而不已，又暗伏冤厲之憂。李翰力勸朝廷表彰張、許之忠，另一論點便是著眼於「強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申言朝廷必須立廟祭祀張、許及其兵眾，透過中央封祀，安撫羈縻凶死將士，「使九泉之魂，猶思效命，三軍之眾，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sup>107</sup>戰爭導致的集體暴力，透過封祀安鎮，張、許二人從慘死忠臣、厲鬼，終而封神。

可以說，死守睢陽故事隱含了大忠與大凶、節義與仁愛最激烈的辯證。<sup>108</sup>朝鮮本中的張巡敘事從「罵賊」轉為「死守」，將熱血節義故事中慣見的「罵賊」模式，予以變化。敘事焦點的改易同時延展、強化

<sup>105</sup> 李翰，〈進張巡中丞傳表〉(收入董誥等編，《全唐文》，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430，頁1938。

<sup>106</sup> 參見孫邦金，〈明清儒學對君臣關係與忠君倫理的多元省思〉，《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8：3(武漢，2015.5)，頁35-37。

<sup>107</sup> 李翰，〈進張巡中丞傳表〉，頁7b。

<sup>108</sup> 王夫之自「人道」、「人心」切入反駁李翰可謂切中要害：「李翰為之辯曰：『損數百人以全天下。』損者，不恤其死則可矣，使之致死則可矣，殺之、鬻之、齧而吞之，豈損之謂乎？夫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聞言而心悸，遙想而神驚矣。於此而忍焉，則必非人而後可。巡抑幸而城陷身死，與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後，救且至，城且全，論功行賞，尊位重祿不得而辭，紫衣金佩，赫奕顯榮，於斯時也，念齧筋噬骨之慘，又將何地以自容哉？」王夫之，《讀通鑒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卷23，〈肅宗〉，頁10b-11a。



了這類節義敘事的要素。張、許的無畏表現不在最終「罵賊」的時刻，而在剛毅沉著面對守城無援步步陷入絕境，最終「力竭」從容赴死的過程。此一「竭」字當中至慘至哀：巡、遠若僅竭一己之力，兩人殉國，不足以守睢陽；為使睢陽得守，東南得救，城中婦人老弱生民之命因此「竭盡」。面對這幾乎全城俱沒的慘境，將領個人所受的刑殺似乎幾已顯得輕微，也宜乎此則敘事略去「抉齒」一事，易以「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如此訴諸冥報之咒願，似乎召喚超越人世的天地神鬼，方足以回應敘事中的巨大犧牲，忠臣生民同歷共感的身心痛楚。

《日記故事》作為初階讀物雖然旨在簡要，然面對這驚心動魄的「忠德」經典，如何為之「插圖」恐怕仍費思量。朝鮮本插圖避開了「分城死守」最決絕駭人的一面，亦未選擇描繪張巡受刑時刻。相對於顏杲卿和孫揆解甲赤身受縛，「分城死守」圖中(附圖 5)，忠臣身著戎服，威儀揚顯，其位置在圖中央偏上方，居高臨下，兩側各立侍衛一名，侍衛兩旁大旗飄揚。圖像畫面以左下至右上對角線分為兩部分，上半部侍衛與纛旗成列夾護忠臣，下半部城牆磚形整密，城門緊閉，暗示守城嚴固。而身著甲冑成列的忠臣衛士，加上磚牆石門共構而成的威重，又被自右下角朝向忠臣人物延伸的雲氣托起。此幅圖像可以被視為忠臣固守城池之貌，同時圖像中心凝聚在雲氣流動線條延伸的端點與忠臣腳下的交接處，彷彿雲氣為護持、托揚忠臣而來。如此插圖迴避了糧盡相食之「實然」，轉透過迎向忠臣的飄風雲氣製造出忠臣精神與天相感之「應然」，使端坐於城牆上的忠臣看來宛若神明，也呼應著張、許事蹟自唐宋以降透過官方及民間崇祀化鬼為神，經明清兩代不歇的宗教文化內質。<sup>109</sup>

<sup>109</sup> 關於張、許信仰的發展，參見范純武，〈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3)，頁 25-67。

整體而言，這些高度濃縮自史傳經典，長度在五十到二百字之間的敘述，在《日記故事》中鋪排出一系列忠德典型，將抽象的「忠」概念，具象化為一個個忠臣烈士在特定時刻的言行舉動。各大主題之下涵納不同模式(如死節與忠諫事例或激昂或從容)，模式之下個別事例細節又有所別異，如同環繞主旋律的不同變奏。每則敘事取當中的焦點行動、主要物件、或關鍵話語，再提要濃縮擬成便於記憶的四字標題。我們不難推想，對熟悉《日記故事》的近世讀者而言，「何為忠」、「如何作忠」這樣的問題所對應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便是這些故事類型。

這些類型當中，以帶有衝突性的死節、忠諫事例，無論在數量、優先排列、敘事戲劇效果上，最顯突出，可說是書中最引人注目的忠臣典型。或許也正因此，萬曆年間(1573-1620)標榜「溫陵張瑞圖校」的劉龍田本中，「忠諫」與「臣道」類故事標題與內容愈形聳動。此本不僅將顏杲卿與孫揆故事標題從「瞋目罵賊」、「罵賊至死」再改為「噉肉斷舌」、「解鋸束板」，並且加入了許多其他各版《日記故事》少見的忠節事例，包括殷商比干「死甘剖心」、春秋秦國禽息「擊車爛腦」、春秋衛國「弘演納肝」、東漢臧洪(160-196)「烹妾食將」、<sup>110</sup>唐代安金藏「剖心停鞠」、明代濮真「剖心示虜」。明中葉以降，史傳、小說、戲曲中的節義忠臣表述，遭斷舌、敲牙、節解細剮並被迫自噉其肉的敘述重複出現幾成套式，<sup>111</sup>與此處忠節故事益發暴力化的傾向，相互呼應。

<sup>110</sup> 書中「烹妾食將」與張、許「分城死守」兩則故事並列，更強化「殺妾食士」的內容。

<sup>111</sup> 如方孝孺之死在史傳、戲曲中的表現，參見劉瓊云，〈清初《千忠錄》裡的身體、聲情與忠臣記憶〉，《戲劇研究》，17(臺北，2016)，頁8-18。另一位「靖難」忠臣練子寧的記載：「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鄭曉，《建文遜國臣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隆慶元年[1567]鄭履淳刻本影印)，卷3，〈御史大夫練子寧〉，頁6a。李玉

另一方面，也出版於萬曆年間，刊印品質與劉龍田本同樣精良的鄭世豪本，則特別標榜是編有助科考，<sup>112</sup>故其編輯策略不走極端而選擇雅化路線。此本題「嶺南亞魁吳宗札校正、武夷門人彭濟評註、閩建書林鄭世豪繡梓」，<sup>113</sup>易《日記故事》慣見的四字標題為五言，五言故事標題每八句串連成詩，全書目錄由 40 首五言八句聯詩組成。相對於一般《日記故事》沿襲《大學》修、齊、治、平的進階次序，習慣將忠德類故事至於全書之末，此本置「忠君」類故事於第一卷，其中以 8 則「明君」故事為首，內涵早期忠觀視「忠」不專為臣德，亦為君德的理念。<sup>114</sup>其下 32 則忠臣故事主要涵蓋直諫與節義主題，另將「治國」置於卷 4 全書之末：此本治國類故事之多，與朝鮮本幾可相匹，可見質量較高的版本，相對會給予敘事內容雖不刺激，但仍屬「忠德」重要面向的良臣善政故事相當的篇幅，呼應本文第二部分所言，《忠經》對於人臣「正國安人」之責的強調。由此透露此本所預設讀者較一般《日記故事》更為高階，應是鎖定程度稍高的舉子。但即使如此，此本仍選擇直諫與節義主題故事放在開篇「忠君」類下，顯示編者仍注意標舉這些故事「開宗明義」的作用；此二類型在《日記故事》的忠德範式中，始終突出。另外，除了《日記故事》正文間常見的音釋、夾註，此本上欄加入大量評註文字，或補充史傳中的細

---

《清忠譜》寫東林忠良周順昌對抗魏忠賢，遭陷下獄受酷刑而死，周氏罵賊亦有「齒雖斷、舌還在」、恨「有口不能咀賊肉，好將碎齒嚼奸腸」之言。李玉撰，陳古虞、陳多、馬聖貴點校，《李玉戲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1361、1362。

<sup>112</sup> 「習舉子業者默識心融而時出之，則左右逢原，大有裨於二、三場之用。」見此本中吳宗札所撰序文，頁 4a-4b。

<sup>113</sup> 鄭世豪本，卷 1，頁 1b。

<sup>114</sup>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頁 89-105。《忠經》臣德篇章之前，亦先自〈聖君章〉進入。

節、或徵引如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宋代胡寅(1098-1156)《致堂讀史管見》、范祖禹(1041-1098)《唐鑒》、明代丁奉(1480-1542)《通鑑節要》等史論評述，皆可見編刊者在原本《日記故事》蒙學內容基礎上增補材料加強實用性，以此招攬考生讀者的擴編策略。

此本不似朝鮮本，每則故事上圖下文，而是上欄評註，下欄故事正文，每類中擇數則故事配以全幅插圖。<sup>115</sup>君臣類故事中附插圖的四則忠臣故事分別為：「牧羊持節臣」蘇武、「子姪孰為親」中成功諫言，打消武則天(690-705 在位)立其姪武三思(?-707)為太子之想的狄仁傑(630-700)、「焚死詐降楚」中為救劉邦遭項羽焚死的紀信(?-204 BC)、以及「願為趙氏鬼」中拒絕降金的楊邦義(1085?-1129)。除了蘇武之外，狄仁傑、紀信與楊邦義皆非《日記故事》中慣常收入的忠臣人物，再次顯示此本欲自區別於坊間他本的做法。四幅圖中，忠臣的身體姿態皆端正收斂。忠諫之臣狄仁傑與武后分占畫面右下與左上方兩端，後者端坐上位，前者執笏跪地俯身禮敬；節義忠臣蘇武、紀信、楊邦義皆位於畫面中間部位，或坐或跪，雖是北邊寒地苦節或戰時情境，忠臣四周卻仍山石花草圍繞，可見這些圖像意不在「寫實」，而是透過「雅化」裝飾呈現主角人物之從容寧和。其中「願為趙氏鬼」插圖雅化暴力死亡的操作，尤值得注意。

鄭世豪本中「願為趙氏鬼」敘事簡短，圖像中卻另有文章(附圖 6)：

宋端平間，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光、李悅迎降。通判楊邦義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令射殺之。若邦義之死

<sup>115</sup> 學者指出晚明建陽書肆由於面對金陵派和徽派書籍版畫的市場競爭，除了繼續建陽書籍上圖下文的形式，也開始自行製作或與江南、徽州書坊合作單面大幅版畫。鄭世豪本可能即為此類例子。薄松年，〈古樸純真的建安古代版畫〉，頁 4-5。

節，可謂盡臣道矣。視彼迎降者，寧不深可媿哉？<sup>116</sup>

其故事文字自「通判楊邦義」至「遂令射殺之」，與《宋史紀事本末》所載幾全同，唯後者作「大罵求死，遂殺之」，鄭世豪本作「乞死」、「遂令射殺之」。<sup>117</sup>宋代史料或略言楊邦義不降仗節以死、<sup>118</sup>罵賊而死、<sup>119</sup>以首觸堦求死，<sup>120</sup>或詳載其拒降，大罵金兵將領——金太祖(1115-1123 在位)之子兀朮(?-1148)，終遭剖腹取心而死，<sup>121</sup>然而並不見楊邦義遭「射殺」的說法。箇中玄機，要落在敘事上欄的評註中。此段評註言：「元末陳友諒寇太平縣，判(筆者按：樞密院院判)花雲迎戰，大罵，賊怒，碎雲首，縛于舟檣，叢射之，與此忠義同。」<sup>122</sup>標題「願為趙氏鬼」的圖像，刻劃的內容其實是元明之際，朱元璋麾下猛將花雲(1321-1360)與陳友諒(1320-1363)相抗之事。當時朱元璋與陳友諒爭奪控制長江中下

116 鄭世豪本，卷 1，〈願為趙氏鬼〉，頁 24b。

117 馮琦編、陳邦瞻增輯，《宋史紀事本末》(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5，〈金人渡江南侵〉，頁 2b。

118 如陳東，《靖炎兩朝見聞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刻宣統元年[1909]印碧琳琅館叢書本影印)，下卷，頁 19a。熊克，《宋中興紀事本末》(合肥：黃山書社，2008，據清雍正景鈔宋本影印)，卷 71，頁 1b。

119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35，頁 2a-b。

120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2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29，頁 18b。

121 詳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7，〈楊邦義·忠襄公〉，頁 11b-12a。類似敘事亦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 118，〈父同故潭州司戶參軍贈宣義郎〉，頁 28b-29a。

122 鄭世豪本，卷 1，〈願為趙氏鬼〉，頁 24b。

游，位於今安徽當塗、蕪湖一帶的太平縣，乃南京城上游屏障。此役花雲壯烈而死，不僅史傳著錄，<sup>123</sup>講述明代開國故事，晚明幾經改寫重刊的小說《英烈傳》各版本亦無不分章標目記載此事。<sup>124</sup>

此外，走精品路線經營環翠堂書坊的知名徽商汪廷訥(約 1567-?)輯錄歷朝人物懿行，配以精刻圖像作《人鏡陽秋》一書。<sup>125</sup>此書分「忠孝節義」四類，「忠」類之下便收有花雲事，且其插圖中刻劃忠臣裸露飽滿軀體受縛於一桅杆高處，射手隔水張弓發箭的構圖，與此處「願為趙氏鬼」圖像相當近似(附圖 7)。學者推測《人鏡陽秋》首刊時間應不早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日記故事》鄭世豪本則刊行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由於此本首頁所列校正吳宗札、評註彭濱及刊行者鄭世豪資料缺乏，我們難以判斷《人鏡陽秋》中的「花雲」圖是否襲自鄭世豪本，抑或當時兩書之外還有其他類似的花雲故事構圖流通，只是筆者尚未得見。不過即使僅就目前兩幅「花雲」圖觀之，已明顯可見鄭世豪本同《人鏡陽秋》走的都是雅化路線。而相對於後者表現花雲中箭之軀，前者則選擇迴避，將時間點落在射手張滿弓，箭在弦上將發而未發之際。

<sup>123</sup> 如高岱《鴻猷錄》載：「庚子閏五月，陳友諒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禦之。三日，友諒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雲士卒憊不能戰，城遂陷。友諒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縛吾。吾主必滅爾，斬為膾也。』奮躍大呼，縛皆絕。雲起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雲，碎雲首，縛置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輟。」高岱，《鴻猷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高思誠刻本影印)，卷 2，〈褒顯忠烈〉，頁 12a。

<sup>124</sup> 其中包括余象斗「三台館」梓行《官板皇明全像英烈誌傳》、楊明峰刊本《皇明開運英武傳》、崇禎年間《玉茗堂批點英烈傳》等。

<sup>125</sup> 關於汪廷訥如何透過出版《人鏡陽秋》這樣精美的規鑒故事書籍自我行銷，參見 Li-chiang Lin, "Wang Tingne Unveil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te Ming Woodblock-Printed Book *Renjing Yangqiu*," *Bulletin de l'Écol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95 / 96 (2008-2009): 291-329.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鄭世豪本故事內容隱含的暴力性與雅化圖像之間的反差。敘事與評註中，楊邦義血書，花雲碎首遭縛柱叢射，兩人死事的表述模式及壯烈程度並無異於前論節義忠臣典範。鄭世豪本一方面承襲《日記故事》聚焦忠臣受刑就義時刻的文圖傳統，另一方面又設法淡化、甚至美化行刑時不可避免的暴力內容。繪圖者就事發之地——建康(南京)——臨江的地理位置加以發揮。此處飄風雲氣之外，弓箭手行刑立於舟中，船下水波、岸邊垂柳乃至飽張之弓，使全圖富於各式圓弧線條，氣韻流暢，轉化敘事中的身體暴力成為視覺美學。一水之隔分置忠臣及數名弓箭手於左右兩側。左側江上一舟，舟廬當中侍衛一名，廬頂上忠臣呈跪立姿態，雙手反置背後，看似受綁縛於船桅之前，但忠臣身上並不見繩索枷械。廬中侍衛距離受刑人最近，職當監押其人，但構圖將忠臣置於廬頂，逆轉了監押者與受刑人之間的制約關係，使後者在身體位置上反凌駕後者，圖像對側三位弓箭手，雖分從上下兩處張弓對準矛頭，但眼神與弓箭方向皆是隔水由下而上仰望忠臣，也倒轉了行刑與受刑人的勢力高下。

而我們也不當忽視，相對於早期《日記故事》摘取史傳正典成文，圖文編排一圖一事，鄭世豪本中故事和評註文字以及圖像表現的關係更為多元複雜：當中史書、通俗類書、小說、精刻規鑒故事書籍互文交錯；書中新收故事與當時流行題材關係益趨密切；兩位忠臣人物事蹟細節經安排取捨匯入一圖，使此圖既針對特定忠臣事蹟，又帶有超出個體性，表現忠烈身心自安無懼之精神共相的性質。

上述分析顯示，如何處理忠德內蘊的暴力性，始終是《日記故事》編者注意的問題。無論諫上(文)或禦侮(武)，忠德內蘊暴力性，乃因其所根源「安定社稷」高於君主私利之目標，<sup>126</sup>要求並支持士大夫不屈

<sup>126</sup> 參見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頁88。

從於強勢威權的抗議精神，賦予知識分子與「害社稷」之勢力相抗的理據。然而同時也是「安定社稷」的準則，在後世「忠德」的論述中，對士大夫抗議的方式和激烈程度予以節制，要求謹慎。抗議的力度與「盡忠」、「竭力」之「盡」與「竭」的限度，始終在道德天平的兩端拉鋸，勉力均衡，一不慎，犧牲生命感天動地的超人之忠，便要落入「不仁」之慘傷。<sup>127</sup>

## 五、文化網絡下的《日記故事》——再思其讀者、讀法與用途

本文分析朝鮮本中激烈、從容兩種典型，持節盡忠的難處與裁量，已顯見其中。萬曆劉龍田本中故事內容選擇的暴力強化與鄭世豪本的圖像雅化，乍看是兩個不同的走向，然而受眾透過閱讀、聽講，自敘事中得到意興勃發的刺激；透過雅化圖像，接受忠臣超昇的英雄化形象，圖文各自發揮作用，互補協同形塑通俗忠觀，亦並非不可能。我們或許無法精確切畫出明代《日記故事》的讀者群；讀者接受反應的個別差異，也難以簡單概論；不過結合前文對《日記故事》的細部分析與現存關於此書用例的記載，筆者以為，此書的讀者、讀法與傳播作用，值得再思。

橋本草子相當正確推估《日記故事》的使用者大致包括社學內 8 到 15 歲之學員，上層家庭女性及初學幼童。<sup>128</sup>然而目前研究鮮少留意的，是此書閱讀接受的情境反應，與他類文本彼此連結滲透的關係，以及網絡式延展傳播的作用。我們不妨從唐順之(1507-1560)〈盛孺人墓

<sup>127</sup> 如王夫之論張巡死守：「張巡捐生殉國，血戰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績，……。

雖然，其食人也，不謂之不仁也不可。……若張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王夫之，《讀通鑒論》，卷 23，〈肅宗〉，頁 10b-11a。

<sup>128</sup> 橋本草子，〈「日記故事」の現存刊本及びその出版の背景について〉，頁 120。



誌銘〉中的一段文字出發思考：

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旨，故生平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間，則取《小學日記故事》、稗官小說，家誦說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則擊手詫嘆，以為烈士當如是。<sup>129</sup>

此段記載常被用來引證《日記故事》讀者除學童之外，還包括士紳家庭女性。較少被注意到的是，此處《日記故事》與「稗官小說」並列，對讀者來說兩者乃相近類似的讀物，講述的都是歷史人物言行故事，而特別令這位盛孺人「擊手詫嘆」的烈士「壯節偉行」，極可能便是前兩節文中討論的節義類典範。朱澍(1486-1552)描寫福建莆田同鄉黃道卿之母唐氏美德：「慈惠逮下，淑均四子，襟裾不問，可知其所出，能言口授以《小學日記故事》，女賓至，必令朗誦講解為懽」，<sup>130</sup>另道出唐氏女性親友聚會，誦說書中故事愉悅「為懽」的畫面。

而當我們將眼光展放到他類文本中，將發現《日記故事》不僅與稗官小說、歷史演義內容多有重疊，前者宛如後者的人物事件選粹，後者則將前者的簡要陳述置回始末完整的長篇敘事中。本文所分析的忠德結構亦非《日記故事》所獨有，而與戲曲傳統關聯。朱權(1378-1448)《太和正音譜》中列「雜劇十二科」，以「君臣」為題材者占其四：「披袍秉笏」(其下標註「即君臣雜劇」)、「忠臣烈士」、「斥奸罵讒」、「孤臣逐子」，其中前三類與《日記故事》透過善政、忠諫、死節三面向表現的「忠君」之道相互呼應。<sup>131</sup>所存劇目如《董宣強項》、《蘇武持節》、《陵母伏

<sup>129</sup> 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集部，第3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本刊本影印)，卷15，〈盛孺人墓誌銘〉，頁305。

<sup>130</sup> 朱澍，《天馬山房遺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3，〈榮壽慶辭〉，頁477。

<sup>131</sup> 朱權撰，姚品文點校箋評，洛地審訂，《太和正音譜箋評》(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38。

刃》、《火燒紀信》、《比干剖腹》、《豫讓吞炭》、以及受到元代宮廷喜愛，中央號令使各路傳唱的《屍諫靈公》，<sup>132</sup>這些人物事件亦見於元代《君臣故事》與明代各本《日記故事》中。而之後戲曲作品中的忠義角色，復一再召喚這些歷史人物及其標誌事蹟。<sup>133</sup>明中葉以降忠臣敘事乃至實際作為戲劇化、暴力化的傾向，與《日記故事》連結通俗藝文所構成之「忠文化」範式之間的關聯，值得深思。

換言之，儘管現代研究將《日記故事》定位為「蒙書」、「道德類書」，確實掌握到了這類讀物以「幼學」、教化為編輯宗旨的特質，但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日記故事》傳遞流播的空間，當不限於學堂與士紳家庭。若將《日記故事》置於更大的文化生產與社會實踐場域思考，這些從家庭、地方學校開始講授的歷史人物事蹟，又可與戲劇、說書等公共展演形式相連貫，共同串接形成一價值系統表述網絡。由此思之，「閱讀」《日記故事》的方式不僅是幼童、學童接受家庭成員、師長講授；粗識文字的低階成人讀者也可能透過戲曲、說書先熟

132 朱有燉〈元宮詞〉：「《屍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至九重知。奉宣贊與中書省，諸路都叫唱此詞。」詳見汪詩珮，〈歷史、戲劇、政治的三重奏——《周公攝政》與鄭光祖的雙重心境〉，《國文學報》，50(臺北，2011.12)，頁296-297。

133 例子頗多，如《拜月亭記》(又名《幽閨記》)中金國忠臣陀滿海牙以笏擊打奸臣聶賈列，口唱「你為人何太諛……把聖聰蒙蔽，俺學得是段秀實以笏擊賊。」施惠，《幽閨記》(收入《喜咏軒叢書》，第9冊，臺北：廣文書局，1983，據武進涉園陶氏刊訂本影印)，卷1，〈罔害瞻良〉，頁11a-b。《鳴鳳記》第五齣中，楊繼盛以「蘇武持節」、「張綱埋輪」二事自勵；第六齣中夏言以「睢陽一城張巡死守」斥責拒絕發兵收復河套的奸臣嚴嵩；第九齣夏言因反對嚴嵩直言被斬，唱詞描述「只聽得喧聲震動。刀飛雪，斷卻常山舌」；第十四齣中楊繼盛誓死彈劾嚴嵩，其妻相勸「妾願相公為良臣，不願相公為忠臣」，文字明顯脫化自魏徵「願為良臣」故事。楊繼盛死後，其妻祭文唱詞標榜其忠使「奸回斂手，鬼神號泣。一言犯威，五刑殉裂。關腦比心、嚴顏稽血、朱檻段笏、張齒顏舌，夫君不愧，含笑酒泉。」王世貞，《繡刻鳴鳳記定本》(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70)，頁17-21、24、39、61。

悉某些忠義事蹟，當有機會翻閱《日記故事》這類書籍時，再反向「印證」這些歷史人物、英雄故事的文典出處，體驗原本於戲臺、口述空間中流動的情節事蹟，轉化為刻本插圖固著於書籍物質媒介，一一展列於書頁間的新鮮感受。這些道德故事的傳播接受並非單向「灌輸」的過程，而是多元、雙向、跨媒介的運作，「故事」透過多重媒體滲透漫衍的力量，不容忽視。

再則，《日記故事》內容無疑關乎道德，卻不限於道德，它同時還是極佳的歷史知識、典故來源。長年為諸生坐館的溫璜(1585-1645，溫體仁[1573-1638]從弟)談館約言：「村塾《日記故事》晚課對偶，使良師為之，即是詩才史學也，烏乎廢。」<sup>134</sup>言下之意，此類教科書若良師使用得當，確實具有教授學生詩才史學入門的作用。稍晚一些，出身福建漳浦的康熙年間(1661-1722)進士蔡世遠(1682-1733)記其家塾教學：

凡子弟生徒，午飯後各粘楮片於壁間，嘉言善行皆可書，或《小學》、或《日記故事》、或《綱鑑》、《性理》，末書某月某日某人書，既有以觸發其性情，閑邪心而起善念，又有以長益其記誦。人日一條，每年則有三百條，十人同學，則有三千條……。<sup>135</sup>

從中可見蔡世遠認為集「同學」之力，日日書寫張貼並標記寫者姓名，經年累月，塾室牆上羅列百千條賢人事蹟，既可端正生徒言行心性，又助益人物史事記誦，一舉兩得。《日記故事》與性理之作、綱目性史書合而為用，透過學校教育進入學童日常生活的運作，於此清晰可見。

<sup>134</sup> 溫璜，《溫寶忠先生遺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8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貞石堂刻本影印)，卷7，〈館約〉，頁11b。

<sup>135</sup>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11，〈帖家塾〉，頁21b。

這些歷史知識不僅有助科舉作文引證舉例，以古論今；士子之外，即使是幼童與教育程度有限的成人，看戲聽書也多半要遇上擊賊笏、常山舌、睢陽齒的典故，娛樂活動與相關歷史知識的攝取同時並行；城市遊俠、地方耆老在地方上立身行事、排紛解難、說理服人，同樣派得上用場。從娛樂、教育到公眾事務，這些人物故事指引著近世社會大眾對於忠良奸邪的區分、政治人物言行的評判、各層人倫關係與道德是非的理解與想像。王鴻泰從傳播媒體的角度討論明清社會中公眾意見的形成與運作，<sup>136</sup>如果我們進一步探問，群眾抗議無行官員士紳，尋求社會正義的輿論，其背後的價值系統與批判基準源自何處，則歷史事例與人物典範附著於書籍、表演傳播的作用，亦值得考慮。化身為歷史事例的教化內容未必只能是僵化教條，也可能在「市井俗夫」的生活中，化為指導公眾事務參與的知識道德力量和實際有用的文化資本。

《日記故事》自明代前期，已是相當常見的教學材料。<sup>137</sup>而教科書(特別是經背誦的教科書內容)日積月累在學童讀者身上可能的作用，就縱向個人成長歷程來看，隨著這些學童或粗識文理便操持農商百工營生，或成為塾師秀才中下層知識人，或成功步入仕途為官從政，或成為文宗大儒，此一基本範式在不同受眾內中持續發展變化。在淺層，它提供為人行事的道德準則，或至少是非之辨；入深層，道德類書故事往往多從正史敘事中簡化而來，有志於學者從《日記故事》入門，進入史書經典，再反思幼學之不足偏失，評估各人物典範故事於其當世之適用性，甚或親身經歷儒家思想體系內部的倫理困境而批判創化。光譜散放，其顏色深淺光彩明晦因人、因社會階層而異，然其原初核心種子大致包羅於《日記故事》這樣的書籍之中。此亦本文的討

<sup>136</sup> 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12(臺北，2009.6)，頁 73-87。

<sup>137</sup> 葉盛撰，魏中平點校，《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31。

論第一部分始於《日記故事》教育面向的原因。

其次，就感知作用的外在環境而言，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研究晚明《列女傳》的社會使用時已洞見指出，圖文並行的通俗道德書籍一方面符合倫理正統性具有他類出版品不及的文化聲譽(cultural prestige)，另一方面編刊者可藉由故事、圖像吸引讀者，雙方面結合，具有某種「教化娛樂」的性質，既合於官方士人正風化的要求，也能為書商牟利，經濟與文化誘因相輔並行，故而不同編者書坊願意一再投資刊刻，版本多樣。<sup>138</sup>在這些方面，《日記故事》與《列女傳》的情況相當類似。上文唐順之、朱泚關於盛孺人、朱氏的記述，亦顯示雖然《日記故事》對於具有社會地位的男性士人不具標榜價值，但對於其女性親族而言，此書必然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指標性，才會在壽辭、墓誌銘的記述中被提及，呼應著柯麗德所言的文化聲譽。

此外學者業已指出，王陽明(1472-1529)「堯舜人人可學而至」之說及其後學流播與晚明出版活動的關係。<sup>139</sup>由此思考，《日記故事》這般羅列展示嘉言懿行的通俗書籍，相當適合作為凡庶仿賢學聖的入門讀物。晚明《帝鑑圖說》、《養正圖解》兩部分由張居正(1525-1582)、焦竑(1540-1620)為帝王和太子編纂的規鑒故事集，從宮廷流出成為坊間流行版本。<sup>140</sup>不難想見當時書籍市場上，上有「皇室用書」，下有《日記故事》

<sup>138</sup> Katherine Carlitz, "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Lienü Zhuan," *Late Imperial China* 12:2 (December 1991): 117-148.

<sup>139</sup>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China*, edited by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2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sup>140</sup> 相關研究參見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臺北，2012.9)，頁163-224。Julia K. Murray, "Didactic Picture 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ited by David M. Robinson, 231-268

這樣面對廣大中下層讀者的道德故事類書，兩者讀者設定不同，但透過故事輔以圖像講學育德的本質則近似。淺近的《日記故事》在位階上與皇室用書大不相同，但又與之遙相呼應宛如「群眾版」的學聖成德之書，並使讀者得以透過印刷媒介將歷代賢良事蹟「把握」於一書之中，此可視為《日記故事》「文化聲譽」運作的另一面向。除了社會環境，本文第二、三部分深入幾部特別重要的《日記故事》版本，分析其結構模式、文圖表現，則是試圖從書籍內部本身，說明書中故事「動」人的作用。此處所謂「動」人，未必是感動，也可以是觸動、刺激等種種程度不一，使某些人物範式留在讀者腦海心間的反應。合觀《日記故事》使用的外在社會環境與書籍內在特質，足見此書在當時流行普遍的原因，及其在社會、學校、家庭內部被認可、使用並喜愛的事實。

第三，就《日記故事》與小說、戲曲合而構成通俗忠文化滲入士庶生活的傳媒網絡而言，不僅三者間共享著許多歷史人物故事主題，晚明清初小說戲曲甚至將《日記故事》直接帶入其人物敘寫之中。如王衡(1561-1609)雜劇作品《鬱輪袍》講才華出眾的詩人王維(?-761)因拒絕依附權貴，科考時被一同應考的無學俗子王推趁機冒名頂替得到薦舉。劇中凸顯王推才學淺薄，語帶得意自言其作詩用典取自《日記故事》。<sup>141</sup>話本小說《西湖二集·愚郡守玉殿生春》講述一位天生愚鈍但生性老實善良的趙雄，因讀了《日記故事》仿效書中人物而幸運中舉。無論是用以標誌士子無才，或幫助憨直考生中舉，<sup>142</sup>兩部作品都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sup>141</sup> 王衡，《鬱輪袍》(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6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崇禎刻古今名劇合選本影印)，卷20，第4折，〈一枝花〉，頁15b-16a。

<sup>142</sup> 周清原著，劉耀林、徐元校注，《西湖二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頁70。

直接引用《日記故事》書名作為科舉初級讀物的代表，暗示著此書在當時廣為人知，穿梭於不同文體之間。此外，小川陽一也注意到話本小說《三言》、《二拍》中的入話及正文故事，同見於《日記故事》以及《陰騭文圖說》、《勸戒全書》、《迪吉錄》等「善書」類文本的例子相當多，可見當時有為數不少的道德故事，流動於晚明文學史中慣常被定位為「小說」的作品與「非」小說文本之間。<sup>143</sup>

從閱讀史和知識傳播的角度來看，《日記故事》摘錄史傳正典，提綱挈領，刪除枝節以簡易文言文扼要敘事，夾註解釋當中名物字詞，類似的作法元代《君臣故事》亦是如此。近年歐美學者已經注意到，東亞世界中同樣的主題內容透過繁／簡文言文、評點註解、白話改寫等方式，在漢字系統內不同文類媒介和書寫形式間流轉、相互詮釋並造出新意的文化操作，於古典知識的通俗化與普及傳播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sup>144</sup>中國方面，此一過程大致可說明顯始自宋代，至明代中葉呈現爆發式進展。在此脈絡下，如《日記故事》這類兼具道德與歷史教育作用的通俗書籍，既是連結士與庶、經典與俗說的重要橋樑，也是開發培育中下層讀者，透過講說故事點滴傳播儒家價值的有效媒介。學者討論十六、十七世紀中國中下層讀者時，關注多在《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基礎蒙書、日用類書、以及白話小說的使用者。然而即使是「簡本」白話小說，<sup>145</sup>在閱讀能力的要求上與其他

<sup>143</sup> 小川陽一，〈三言二拍と善書〉，《日本中国学会報》，32(東京，1980)，頁337-360。

<sup>144</sup> 計畫網頁：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Diglossia, and the Rise of Vernaculars in East Asian Classical and Premodern Cultures, “Workshop and Book Project General Outline,” <https://intraling-asia.sciencesconf.org/resource/page/id/4>, accessed May 19, 2019.

<sup>145</sup> 關於中國白話小說簡、繁本區分之討論，及其在閱讀文化史上的意義，參見 Wilt L. Idema,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 (Leiden: E. J. Brill,

幾類書籍仍有相當的距離。若我們考慮學者觀察，由於中國傳統幼學教材絕大多數採用簡易文言書寫，對於初階讀者而言，簡易文言的閱讀極可能較「白話」更為容易，<sup>146</sup>以及前述《日記故事》與小說、戲曲之間的共享主題的關係，則這樣的書籍未嘗不能發揮如現代「橋樑書」的作用，協助引領較低階讀者透過熟悉其文字表述和歷史知識，逐步進入要求更高閱讀能力的文本。

## 六、結語

本文探究兩大問題：一、我們如何更恰切理解《日記故事》的內涵、作用與重要性？二、這樣的材料如何有助從新視角理解「忠文化」在近世中國的傳播？持論過去隱含童蒙／成人、庶民／士人、通俗／菁英二元區隔的認識框架，是「小看」了《日記故事》這樣的書籍在晚明社會中可能的作用方式。跨越現代學科分隔，從更大的文化生產脈絡觀之，《日記故事》既是一部書籍，也不只是一部書籍。其版本眾多深入社會各階層，當中人物故事的傳播，聽講與閱讀並行，圖文並進，乃至紙本印刷與舞台表演彼此呼應，書中故事與其他廣義的「文」學文本交織互文，構成一套結合道德與歷史知識的認知系統，甚至情感結構。

《日記故事》的例子顯示，道德教化未必只能是抽象思想或教條，也體現在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故事之中。這也就聯繫到本文所處理的第二個問題：回到前現代的語境脈絡，「忠」對於時人而言到底是什

---

1974), 119-120. Anne E. McLaren, "Ming Audiences and Vernacular Hermeneutics: The Use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ung Pao* 81 (1995): 51-80.

<sup>146</sup> Cynthia J. Brokaw,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12. Evelyn S. Rawski,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4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麼？本文的考察顯示，除了上層士人的思想性論述，《日記故事》這類透過歷史人物小故事「教忠」、「表忠」的書籍作用不容小覷。儘管「忠德」界定君臣關係，理論上並不涉及不食君祿的下層士人、社會大眾，然而「忠德」自成立之初始終與社稷福祉相扣，官員與君議政、施政、禦敵與百姓民生畢竟仍相關連，因此無論階層，社會大眾仍抱持某種「忠觀」。過去從上層政治思想史視角切入的論述，鮮少留意此種文化性「忠觀」。本文提出，此種文化性忠觀在近世中國社會中的影響流播，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菁英思想性文本，應當合而觀之。而上文所言故事、戲曲小說共同作用的典範符號、意義表述網絡，便是我們理解文化忠觀之由來、樣態的重要資源材料。

本文析論，環繞「忠德」的表述網絡，是個動態多向的文化場域。面對「忠德」內蘊的實踐問題與暴力潛質，《日記故事》編者或嘗試調和，或為吸引讀者持續強化元代《君臣故事》與早期《日記故事》中已共見的暴力忠節敘事，或透過圖文合作視覺美化突顯忠臣人物的英雄特質。這些內容編排不僅關乎教化意圖，同時透露書商編者的製作行銷策略與讀者喜好；而讀者喜好，又與本文中所解析，《日記故事》忠諫、節義敘事中身體符號、言辭表述的作用，密切關聯。透過模式重複，聚焦衝突時刻戲劇性言行所呈現的忠臣形象，不僅提供事例，同時飽涵情緒。趙園注意到瀰漫於明代士風中的「戾氣」；<sup>147</sup>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觀察明代中期出版業與忠節記述之暴力化、定型化；<sup>148</sup>我們雖無法確鑿這種社會現象之間的確切關聯，書籍表現與實際行動兩者間共同的趨向，仍值得注意。細審《日記故事》原初的編纂意圖、成書脈絡及內容表現，我們發現書中以歷史人物小故事結

<sup>147</sup>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41。

<sup>148</sup> 劉柏正，〈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政治、暴力與明代中葉的出版業」演講紀要〉，《明代研究》，26（臺北，2016），頁 215-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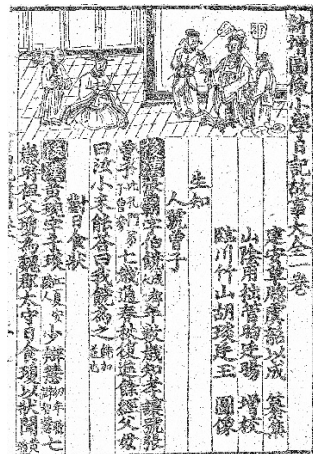
構的道德範式，其實可能鮮活；編者種種裁量斟酌，不同「忠德」模式互補對話，雖非思想傑作，但亦透露出「忠德」內在的兩難，特別是國家秩序、社稷眾人福祉與個人生命、「仁」道之間的矛盾緊張。

綜觀近世中國道德故事類書、戲曲、小說彼此互文交涉的資料，可知至少到元末明初，道德故事類書與戲曲文本對於「君臣」、「忠烈」這類倫理主題，有著共同關注，而此與南宋以降朱子學風的流播應當關聯匪淺。合觀書籍版本數量與實際用例，可以推測到明代前中期，儒家倫理範式已經透過《日記故事》這類書籍進入學童生活之中。至嘉靖時期出版業勃興配合政教、商業需求，《日記故事》版本、刊量再增，有圖無圖、精刻或粗製、長編或簡本，形式多樣，整體又構成一種故事資料庫，可供明末話本小說編作者取材再製。與此同時，相對於《日記故事》事例眾多「極短篇」敘事的呈現，戲曲作品可取故事中的特定類型或母題(motif)予以發揮展演，製造更為「有感」的效果。故事、小說、戲曲構成的忠文化網絡大致如是，其中《日記故事》化經典史傳成通俗教說的中介位置，連結道德教育、歷史知識與通俗藝文生產進入士庶生活的綜合效用，正是這類書籍的特殊文化意義所在。

(本文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收稿；2019 年 4 月 16 日通過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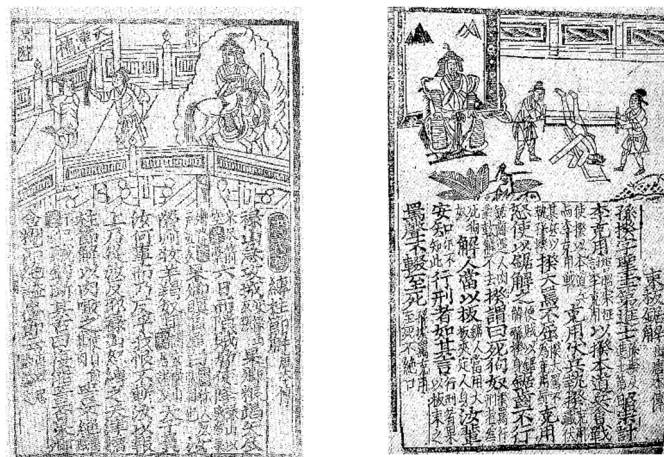
\* 本文初步研究成果曾發表於「士人與近世社會文化變遷 1100-1500」學術研討會。之後蒙科技部「知識、文學技藝與歷史感性」(105-2628-H-001-006-MY3)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支持，以及東京大學大木康教授指引，得進一步考察版本，擴展思考規模，將初稿大幅擴充後發表於中研院文哲所輪值演講，先後從與會學者的提問、反饋中獲益良多，另蒙《新史學》匿名審查人提供具體修改建議，研究助理殷婕、楊宜佩、張閏熙細心協助製表、校對，特此深致謝忱。

附圖1 《日記故事》朝鮮本(蓬左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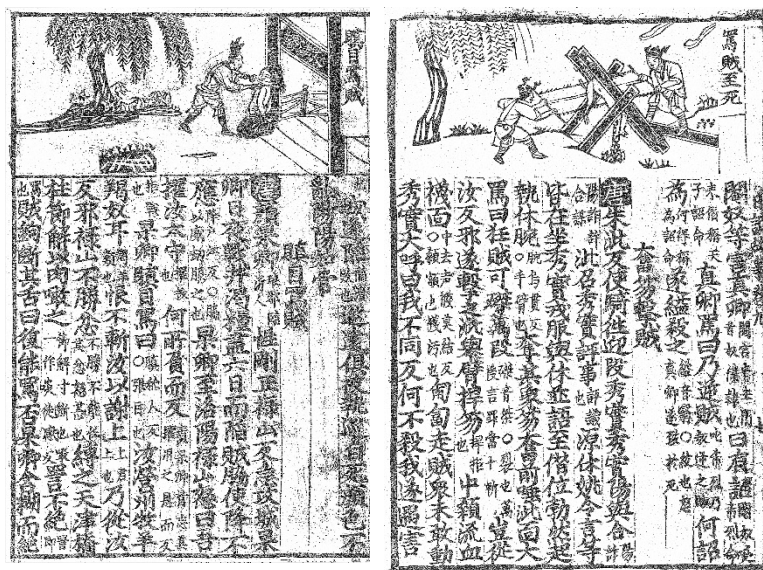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朝鮮本，卷1，頁1a。

附圖2 《君臣故事》五山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



資料來源：不著編者，《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卷上，〈縛柱節解〉、〈束板鋸解〉，頁16a-b。

附圖3 《日記故事》朝鮮本(蓬左文庫藏)



資料來源：朝鮮本，卷9，〈瞋目罵賊〉、〈罵賊至死〉，頁6b、7b。

附圖4 《唐鍾馗全傳》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唐鍾馗全傳》，卷3，〈割舌地獄〉、〈鋸解地獄〉，頁95、113。

附圖5 《日記故事》朝鮮本(蓬左文庫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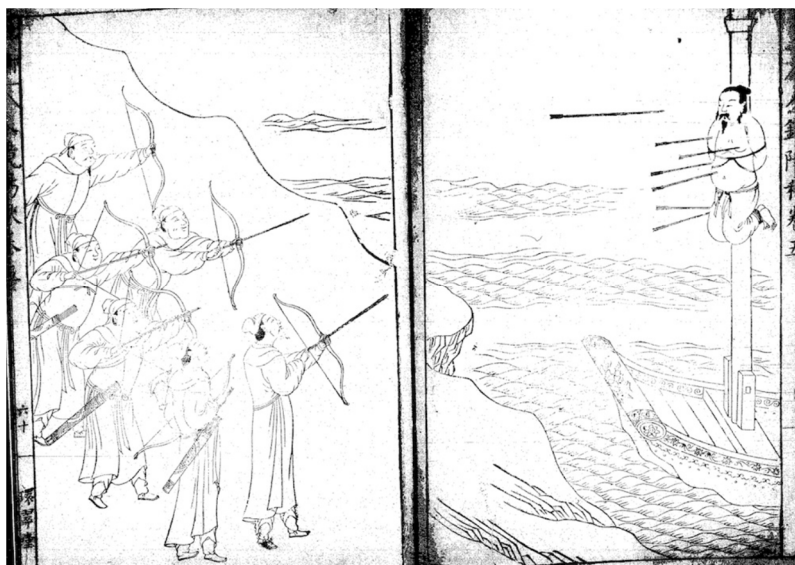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朝鮮本，卷9，〈分城死守〉，頁6a。

附圖6 《日記故事》鄭世豪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藏)



資料來源：鄭世豪本，卷1，〈願為趙氏鬼〉，頁34b-35a。

附圖7 《人鏡陽秋》明萬曆庚子新都汪氏環翠堂刊本



資料來源：汪廷訥，《人鏡陽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庚子新都汪氏環翠堂刊本），卷5，〈花雲〉，頁59b-60a。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不著撰人，《唐鍾馗全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第 19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不詳，據劉雙松刊本影印。

不著編者，《分類合璧圖像句解君臣故事》，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藏，覆元刊本重刊(五山版)。

不著編者，《日記故事》，國家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朱天球刊本。

不著編者，《便覽聯輝日記故事》，日本內閣文庫藏，明魏岐鳳刊本，<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ID=F1000000000000103148&ID=&TYPE=&NO=>，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17 日。

不著編者，《新鐫重訂補遺音釋日記故事大成》，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第 13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據明萬曆年間熊氏雲吾書舍刊本影印。

不著編者，《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魁字便蒙日記故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甲寅年(1614)四有堂周靜吾刊行。

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3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王夫之，《讀通鑒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

王世貞，《繡刻鳴鳳記定本》，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70。

王先謙，《荀子集解》，新北：藝文印書館，1988。

王在晉，《越鐫》，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0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刻本影印。

王衡，《鬱輪袍》，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6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明崇禎刻古今名劇合選本影印。

立庵訓點，《君臣故事》，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 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朱泚，《天馬山房遺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朱熹撰，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朱權撰，姚品文點校箋評，洛地審訂，《太和正音譜箋評》，北京：中華書局，2010。
- 江湖逸士完初子編輯，《新刻標題注釋出像鳳毛日記故事》，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66冊，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據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余熙宇忠慶堂刻本影印。
- 吳宗札校正、彭濟評註、鄭世豪繡梓，《鼎鐫校增評註五倫日記故事大全》，日本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甲午(1594)鄭世豪(雲竹)刊行。
- 呂祖謙，《左氏博議》，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續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李玉撰，陳古虞、陳多、馬聖貴點校，《李玉戲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汪廷訥，《人鏡陽秋》，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庚子(1600)新都汪氏環翠堂刊本。
- 周清原著，劉耀林、徐元校注，《西湖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 施惠，《幽閨記》，收入《喜咏軒叢書》，第9冊，臺北：廣文書局，1983，據武進涉園陶氏刊訂本影印。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唐順之，《荊川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集部，第3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刊本印。
-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5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班固等，《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 高岱，《鴻猷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3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高思誠刻本影印。
- 張之翰，《西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張天復，《鳴玉堂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4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八年(1580)陳文燭刻本影印。
- 張棖，《南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張瑞圖校，《新鐫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收入長澤規矩也編，《和刻本類書集成》，第 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據日本寬文十二年(1672)跋京都上田甚兵衛刊延寶二年(1674)九月印本影印。
- 郭應聘，《郭襄靖公遺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4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郭良翰刻本影印。
- 陳孝逸，《痴山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4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
- 陳東，《靖炎兩朝見聞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44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巴陵方氏廣東刻宣統元年(1909)印碧琳琅館叢書本影印。
- 陳繼儒較釋，《日記餘芳故事》，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明余奉軒刊本，[http://basel.nijl.ac.jp/view/Frame.jsp?DB\\_ID=G0003917KTM&C\\_CODE=XYU1-044-02](http://basel.nijl.ac.jp/view/Frame.jsp?DB_ID=G0003917KTM&C_CODE=XYU1-044-02)，擷取日期：2019 年 6 月 17 日。
- 陶原良詳解，《忠經詳解》，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9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影印。
- 陸游，《劍南詩稿》，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388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
- 馮琦編，陳邦瞻增輯，《宋史紀事本末》，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5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黃仲昭，《八閩通誌》，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78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據天津圖書館藏明弘治刻本影印。
- 黃佐，《泰泉鄉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黃道周，《黃石齋先生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8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鄭玖刻本影印。
- 楊守陳，《楊文懿公文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5 輯，第 1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弘治十二年(1499)楊茂仁刻本影印。

- 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楊喬編，《新刻太倉藏版全補合像註釋大字日記故事》，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室編，《明代通俗日用類書集刊》，第14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據明閩建劉君麗刊本影印。
- 楊萬里，《誠齋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楊萬里，《誠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溫璜，《溫寶忠先生遺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83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貞石堂刻本影印。
- 葉盛撰，魏中平點校，《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
- 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虞韶纂集、熊大木校註，《新刊大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收入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第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據明嘉靖廿一年(1542)刊本影印。
- 虞韶纂集、管昀增校、胡琰圖像，《新增圖像小學日記故事大全》，日本蓬左文庫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朝鮮四字堂錦溪刊本。
- 詹應竹校正，《新鐫徽郡原板校正繪像註釋便覽興賢日記故事》，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辛亥年(1611)黃正甫刊行，<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0103147&ID=&TYPE=&NO=>，擷取日期：2019年6月17日。
- 熊克，《宋中興紀事本末》，合肥：黃山書社，2008，據清雍正景鈔宋本影印。
- 趙歧注，孫爽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孟子注疏》，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蔡獻臣，《清白堂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6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據明崇禎刻本影印。
- 蔣易，《皇元風雅》，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62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圖書館藏元建陽張氏梅溪書院刻本影印。

- 鄭曉，《吾學編》，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隆慶元年(1567)鄭履淳刻本影印。
- 鄭曉，《建文遜國臣記》，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2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隆慶元年(1567)鄭履淳刻本影印。
-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第7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據上海涵芬樓景印。
- 韓愈撰，朱熹考異，《昌黎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集部，第96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據涵芬樓藏元刊本影印。
- 蘇軾，《坡仙集》，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焦竑刻本。
- 顧嗣立編，《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

## 二、近人論著

- 大澤顯浩，〈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明代研究通訊》，5(臺北，2002)，頁11-33。
- 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5。
- 小川陽一，〈三言二拍と善書〉，《日本中国学会報》，32(東京，1980)，頁183-195。
- 井上徹，〈中国近世の都市と礼の威力〉，《年報都市史研究》，15(東京，2007.12)，頁4-18。
- 王子今，《「忠」觀念研究——一種政治道德的文化源流與歷史演變》，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
- 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臺北，2003.9)，頁1-85。
- 王汎森，《思想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中國近代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 王鴻泰，〈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12(臺北，2009.6)，頁41-92。
- 佐藤將之，《中國古代的「忠」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
-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 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

- 巫仁恕，〈評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新史學》，11：3(臺北，2000.9)，頁 213-223。
- 汪詩珮，〈歷史、戲劇、政治的三重奏——《周公攝政》與鄭光祖的雙重心境〉，《國文學報》，50(臺北，2011.12)，頁 275-314。
- 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
- 林麗江，〈明代版畫《養正圖解》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3(臺北，2012.9)，頁 163-224。
- 林桂如，《勸善垂戒，孝行可風從中日出版文化論漢籍之東傳與承衍》，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
- 金文京，〈《孝行錄》と「二十四孝」再論〉，《藝文研究》，65(東京，1994)，頁 269-287。
- 胡文和，〈四川摩崖造像中的《大方廣華嚴十惡品經變》〉，《敦煌研究》，1990：2(蘭州，1990.5)，頁 16-25。
- 范純武，〈雙忠崇祀與中國民間信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3。
- 苑磊，〈明代故事匯編類書籍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2014。
- 孫邦金，〈明清儒學對君臣關係與忠君倫理的多元省思〉，《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8：3(武漢，2015.5)，頁 35-37。
-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6。
- 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收入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東京：国土社，1958，頁 25-154。
- 酒井忠夫，《中国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2011。
- 酒井忠夫，《増補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99-2000。
- 張志公，《傳統語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 曹依婷，〈楊繼盛與「忠臣楊繼盛」之間——一個明代忠臣之再詮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 傅范維，〈從〈諭中原檄〉的傳鈔看明代華夷正統觀的轉變〉，《明代研究》，22(臺北，2014)，頁 51-76。
- 葛荃，《政德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劉天振，《明代通俗類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 劉柏正，〈戴彼得(Peter B. Ditmanson)「政治、暴力與明代中葉的出版業」演講紀要〉，《明代研究》，26(臺北，2016)，頁 215-223。
- 劉祥光，〈中國近世地方教育的發展——徽州文人、塾師與初級教育(1100-180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臺北，1997)，頁 1-45。
- 劉瓊云，〈天道、治術、商品——《忠經》之出版與明代忠文化〉，收入李爽學、胡曉真主編，《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臺北：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2015，頁 318-319。
- 劉瓊云，〈清初《千忠錄》裡的身體、聲情與忠臣記憶〉，《戲劇研究》，17(臺北，2016)，頁 1-40。
- 橋本草子，〈「日記故事」の版本について——二十四孝図研究ノト〉，《人文論叢》，46(京都，1998)，頁 33-58。
- 橋本草子，〈「日記故事」の現存刊本及びその出版の背景について〉，《中國——社會と文化》，21(東京，2006)，頁 108-124。
- 薄松年，〈古樸純真的建安古代版畫〉，收入周芑、周路、周亮編著，《建安古版畫》，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9，頁 4-5。
- 謝正光，〈清初忠君典範之塑造與合流——山東萊陽姜氏行誼考論〉，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頁 291-343。
- Brokaw, Cynthia.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In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China*. Edited by Cynthia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3-5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Carlitz, Katherine. "The Social Uses of Female Virtue in Late Ming Editions of *Lienü Zhuan*." *Late Imperial China* 12:2 (December 1991): 117-148.
- Davis, Richard L.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Epstein, Maram. "Filial Piety as an Emo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Keyword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Wai-ye Li and Yuri Pin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Goldin, Paul R. "When *Zhong* 忠 Does Not Mean 'Loyalty'."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7:2 (June 2008): 165-174.

- Graff, David A. "Meritorious Cannibal: Chang Hsün's Defense of Sui-yang and the Exaltation of Loyalty in an Age of Rebellion."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8:1 (1995):1-17.
- Jay, Jennifer W. *A Change in Dynasties: Loyatism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Bellingham, WA.: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1.
- Idema, Wilt L.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 Leiden: E. J. Brill, 1974.
- Lin, Li-chiang. "Wang Tingne Unveiled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te Ming Woodblock-Printed Book *Renjing Yangqiu*."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95 / 96 (2008-2009): 291-329.
- Liu, Chiung-yun. "Embodied Virtue: How was Loyalty Edited and Performe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Keywords in Chinese Though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Wai-yee Li and Yuri Pin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 Liu, James T. C. "Yüeh Fei (1103-1141) and China's Heritage of Loyal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2 (1972): 291-297.
- McLaren, Anne E. "Ming Audiences and Vernacular Hermeneutics: The Use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oung Pao* 81 (1995): 51-80.
- Murray, Julia K. "Didactic Picture Books for Late Ming Emperors and Princes." I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Edited by David M. Robinson, 231-2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
- Pines, Yuri. "Friends or Foes: Changing Concepts of Ruler-Minister Relations and the Notion of Loyalty in Pre-Imperial China." *Monumenta Serica* 50 (2002): 35-74.
- Puchner, Martin. *The Written World: The Power of Stories to Shape People, History Civiliz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7.
- Rawski, Evelyn. "Problem and Prospects."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399-4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Sibau, Maria Franca. *Reading for the Moral: Exemplarity and the Confucian Moral Imagin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Short Fi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8.
- Standen, Naomi.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 in Liao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 Struve, Lynn A. "Self-Struggles of a Martyr: Memories, Dreams, and Obsessions in the Extant Diary of Huang Chuny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9:2 (December 2009): 343-394.
- Wakeman, Frederic Jr. "Romantics, Sto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In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Edited by Lea H. Wakeman, 98-13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 Zhang, Ying. *Confucian Image Politics: Masculine Moral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 三、網路資料

- 新史學雜誌社，劉瓊云，〈附表 1 各本《日記故事》忠德條目一覽表〉，[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Chiung\\_yun\\_Liu\\_table1\\_newhistory\\_30\\_3.pdf](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Chiung_yun_Liu_table1_newhistory_30_3.pdf)，  
擷取日期：2019 年 9 月 25 日
-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Diglossia, and the Rise of Vernaculars in East Asian Classical and Premodern Cultures. "Workshop and Book Project General Outline." <https://intraling-asia.sciencesconf.org/resource/page/id/4>. Accessed May 19, 2019.

## Loyalty in Print: Knowledge Editing, Discursive Networks, and Story Compendia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ung-yun Liu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Riji gushi* (Stories of the Past to be Remembered Daily), a moral story compendia inspired by Zhu Xi (1130-1200), was first compiled in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in Jianyang, Fujian and was reprinted, reedited, and widely circulated in early modern China as well as in Japan and Kore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wo key questions: First, what were the nature and uses of *Riji gushi*? Second, how did it function as an important medium that promulgated Confucian moral values, particularly the idea of *zhong* (loyalty to the state/emperor)? By examining a rare early edition held in Hōsa Bunko, Japan, and the later editions which mushroomed in the late M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edagogical visions, source materials, editing strategies, and narrative patterns at work that encapsulated the Confucian value system in the form of a storybook. It further demonstrates how the historical paragons featured in this work continued to be incorporated, elaborated, or refashioned in novels and dramas to form a network of culture codes and moral symbols that informed the popular understanding of what loyalty is and how it should be enacted. As publishing culture flourished in the late Ming, publishers promoted sales by adding more violent loyalty stories to cater to the reader's appetite for sensational heroism or by aestheticizing martyrdom through



quality illustrations. Thus although *Riji gushi* was originally designed as a primer, its dissemination through textual and oral transmission and across literary genres eventually took it well beyond the space of schools and households into a much wider social sphere. Here, the ideal of Confucian education, the editing of historical texts, the power of storytelling and the mediation of books and images worked together to shape and reshape popular moral views and imagination.

**Keywords:** *Riji gushi*, loyalty, *leishu*, print culture, textbook